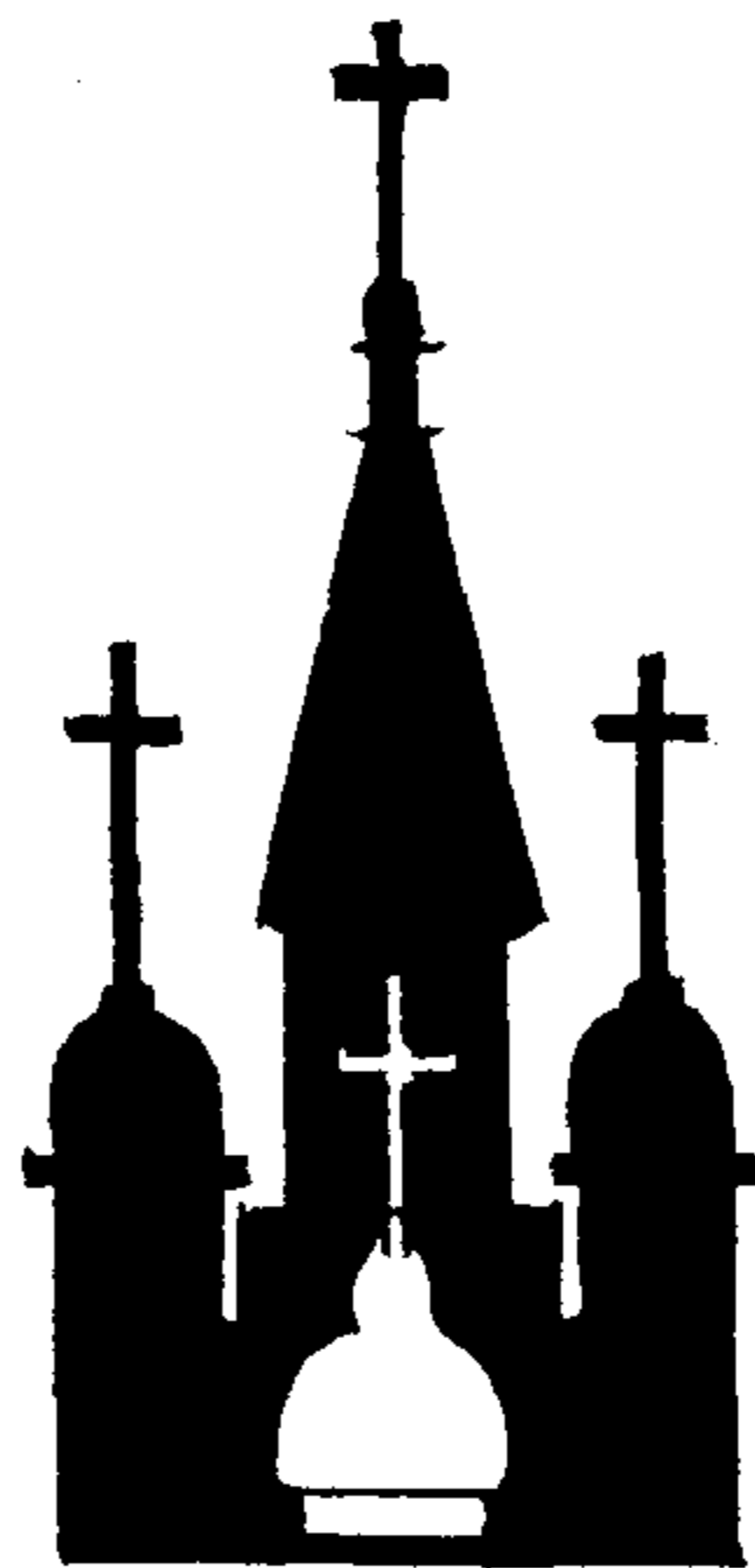


吴克明



俄国  
东正教侵华史略

甘肃人民出版社



# 俄国东正教侵华史略

吴克明

甘肃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冯志毅  
封面设计：王兰江

## 俄国东正教侵华史略

吴克明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5 插页1 字数51,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书号：11096·98 定价：0.38元

# 目 录

引言	1
一、俄国东正教和侵华据点的建立	2
(一) 俄国东正教	2
(二) 俄国东正教会在华据点的建立	6
二、东正教会在华的任务	9
三、俄国东正教会侵华活动的概况	12
四、俄国东正教会在侵华中的地位与作用	26
(一) 直接参与策划对中国的军事侵略	26
(二) 东正教士团在华的政治侵略	31
(三) 积极参与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41
(四) 推行沙俄文化侵略的先导	49
(五) 东正教士团积极参与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 运动	56
(六) 东正教士在华的横行	59
五、俄国东正教会反动势力在中国的覆灭	65
附：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人员和学生及 其他世俗人员情况	69

# 引 言

二百多年来，地处欧洲的沙皇俄国，积极推行殖民主义的扩张政策，在对 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侵略中，先后霸占中国领土共达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其面积相当于现在的三个法国，或者五个意大利。同时，强迫清朝政府赔款共约一亿四千万两白银，开辟通商口岸多处，设立公使、领事馆，划分租界地，取得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特权，掠夺中国的矿产、森林、水产和其它资源，租借旅大港湾，并勾结其它帝国主义，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向中国输入商品和资本，对中国人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为了确保在华的权益，甚至直接派兵血腥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进而肆无忌惮地在中国领土上制造许多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和血案等等。总之，沙皇俄国在华的政策，是一种罄竹难书的罪恶政策。在侵略中国的各个方面，沙皇俄国利用宗教——东正教，真正地起到了“牧师”的得力作用。

富于革命传统的中国各族人民，在反对沙皇俄国的侵略和扩张、其中包括反对东正教的侵略行径方面，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俄国侵略者，一次次地粉碎了沙俄灭亡中国和推行“黄俄罗斯”的险恶阴谋，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特别是中国人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伟大

的胜利，彻底地清除了沙皇俄国的侵略势力，包括东正教的势力，废除了各种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和特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了起来，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当前，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依靠自己的力量，艰苦奋斗，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辛勤劳动。

应当指出，在世界上有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御用学者，或别有用心的人，在所写的文章和书籍中，竭力歪曲中俄关系的历史事实，千方百计地为俄国东正教会和传教士在华的侵略行径辩护，甚至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编造谎言，大肆鼓吹和美化东正教的侵略罪行，说东正教士是“沟通俄中文化的使者”，是“尊重”中国文化，是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为着弄清历史真相，很有必要回顾这段历史，让事实来回答：俄国东正教会和教士到底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友谊”、“福音”呢？还是“侵略”、“灾难”呢？

## 一、俄国东正教和侵华据点的建立

### （一）俄国东正教

东正教，又名希腊正教，是基督教的一大派别，它与天主教、新教同称为基督教的三大派别。

公元四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当时，在罗

马帝国的东部和西部,由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渐渐地,它们之间的差别愈来愈显著,公元1054年,基督教就正式公开分裂成两个大的派别:一是以罗马教皇为首的罗马公教堂,自称“公教”,人们又称它为天主教,这一教派主要分布在当时罗马帝国的西部。二是以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正教会,自称为“正教”,即“正宗的教会”,又称东正教。

公元六世纪,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攫取了东正教的控制权,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东正教会,虽有自己的首领与一定的独立性,但均受其控制。东正教的分布情况,主要是在地中海东部希腊语地区,主要有希腊、俄国、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浦路斯、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家。

公元十世纪以前,欧洲东部斯拉夫人一直信仰多神教。后来,在同拜占廷帝国进行长期的战争,以及相互在经济、贸易的交往中,基辅罗斯的王族、官兵和从事经济贸易的商人,再加上一部分官吏,比较早地接触基督教,并接受教义,进而虔诚地信奉。

公元912至945年间,正是伊戈尔统治基辅罗斯的时期,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王族、亲兵、商人和官吏,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此时,伊戈尔的妻子奥尔加也信仰基督教,这对于基辅罗斯的其他王族成员、亲兵、官吏和百姓,都有较大的影响。更为突出的一件事,是伊戈尔的妻子,于公元957年亲自访问了拜占廷帝国,加强了双方的了解与联系,从而使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逐渐密切,相互影响进一步增强。

公元978至1015年,正是基辅罗斯公国弗拉基米尔大公执

政期间，拜占廷帝国内部发生内乱，再加之对外作战遭到失败。基辅罗斯公国乘机出兵攻打拜占廷帝国，夺得更多的利益。这时，拜占廷帝国内外交困，皇帝巴西尔二世只好向基辅罗斯公国求和，将皇族公主安娜嫁给弗拉基米尔作妾。公主安娜带着基督教神甫，一同前往基辅罗斯公国，进行宗教传播活动，从此，接受洗礼的基辅罗斯人逐渐增加。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正式受洗，信仰基督教。自此以后，全国信奉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同时，弗拉基米尔还强迫公国群众到第聂伯河一带，集体受洗，正式入教。为了扩大基督教的势力和影响，还在基辅罗斯公国一些地方建立教会，建造修道院和教堂，派出神甫到各地传教，特别是向北方罗斯人传道。在公元十一世纪末，基辅罗斯公国封建主义制度已正式确立与巩固，封建主便利用基督教，作为统治国内人民的工具。这时，基督教已分裂为两大派别，即天主教和东正教。基辅罗斯公国正式将东正教定为国教。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与对立，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加强对人民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麻醉，以及对外推行殖民扩张政策，东正教就成为剥削者的有力工具。

东正教会不承认罗马教皇有着比其他主教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主张除主教之外，其他教士都可以婚娶。中世纪时，东正教直接掌握在拜占廷帝国手里。当时，俄罗斯教会属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基督教会大主教管辖，成为基督教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元1453年，拜占廷帝国由于土耳其进攻而覆灭。此时，莫斯科大公乘机使俄罗斯正教会摆脱了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控制，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教会，莫斯科大公自命为东正教会的首脑。公元十五世纪末，以莫斯



科为中心的俄罗斯，摆脱了蒙古金帐汗国的统属后，便向东、西部进行侵略扩张。经过伊凡三世、伊凡四世的统治以后，俄罗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此间，俄罗斯教会紧密地配合俄罗斯帝国推行对外侵略的政策，竭力制造舆论。公元1547年，伊凡四世自封为“沙皇”，不断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霸占邻国的领土。公元1589年，俄罗斯东正教会正式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所属下分立出来，单独成立了牧首区，并设立了大主教。之后，便逐渐成为使用斯拉夫语的俄罗斯正教。这时，俄罗斯东正教会完全受沙皇控制和利用，对内麻痹劳动群众，强化封建农奴制的剥削与压迫，对外推行侵略扩张的殖民政策。

俄国政府为了直接掌握东正教会，于公元1721年专门设立了一个宗教委员会，负责领导东正教会的工作。以后，又把宗教委员会改称为“圣务院”，这是东正教在俄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沙皇政府还竭力支持俄国东正教会，力图使它在各国东正教会中夺取霸主的地位。东正教会则公开承认俄国沙皇是俄罗斯教会的最高首脑。至此，东正教会成为沙皇政府的一个重要的统治工具，成为沙皇俄国统治者的得力帮手。而沙皇政权便把东正教作为进行精神麻醉和文化侵略的得力帮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它派教的重要特征，就是国家和教会、世俗生活和宗教生活混为一体”。

（马克思：《希腊人暴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41页）。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沙皇俄国将在华的东正教会的外交职能和宗教侵略活动的职能加以调整，适当作了具体分工，改变了在形式上的领导关系。俄国政府确定，东正教会在华的活动，概由俄国东正教的牧首公署直接领导和管

理。关于俄国对华外交方面，均由在华的俄国公使馆负责出面交涉与处理。这种领导体制的改变和职能的具体分工，并不意味着沙俄在华东正教会进行的是单纯的宗教活动，这种体制的调整是俄国侵华政策的继续与进一步发展。这样更加有利于俄国在华各个职能部门，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也为在华的俄国东正教，打着信教传教的合法招牌，进行欺骗和阴谋活动提供了方便。

关于俄国东正教神职人员的教阶情况可分为：修士（就是教徒剪发以后）、辅祭、司祭、大司祭、主教、大主教、都主教、牧首等八个教阶。牧首是东正教教阶中最高等级。修士、辅祭、司祭三个等级，统称谓神父。

## （二）俄国东正教会在华据点的建立

早在公元十三世纪，中俄两国之间曾有过一些交往，而宗教方面也有过初步的接触和联系。当时，中国正处于元朝时期，元政府在北京曾设置了“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秩正三品，总斡鲁斯（即俄罗斯）军士”。（《元史》卷三，《文宗本纪》）。由于俄国的传教士、商人、军人等不断来华，东正教随之开始传入中国。俄国在公元十五世纪以前，还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到了公元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期，俄罗斯才逐步地形成了一个封建统一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现代俄国并不是从这个留里克帝国来的，而是从莫斯科公国演变而来的。“是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而不是诺曼时代的粗野光荣，形成了莫斯科公国的摇篮，而现代的俄国只不过是莫斯科公国的变形而已。”（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转引自《历史研究》1978年第1期第6页）。

公元十七世纪中叶，俄国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主义的国家，对外推行穷兵黩武的侵略政策，并开始把魔爪伸进中国黑龙江流域一带。公元1665年，沙皇俄国派遣以切尔尼果夫斯基为首的武装匪徒，强行霸占中国的神圣领土——雅克萨城。随同这一股侵略军一起进犯的东正教士叶尔莫根（原为沙俄基连斯克救世主修道院院长），就利用这个条件，在该城附近建立了俄国在华的第一座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教堂。六年之后，即公元1671年，还是这个东正教士又在雅克萨城郊高地上——磨刀石山，建造了另一座修道院，取名为“仁慈救世主”，或者叫“呈献救世主”。公元1675年，沙皇阿列克谢伊·米哈伊洛维奇派遣特使尼古拉·斯帕法里来中国办理外交、商业事务时，俄国东正教会牧首曾指示托博尔斯克大主教沃洛格，加紧“配备神父一名，在前往中国的长途旅行中，为大君主（沙皇）效劳。”（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三册第183号文件，1972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48页）。东正教会的势力还未站稳脚根，由于中国军民坚决反对俄国的侵略行径，在雅克萨城进行了自卫反击的战斗，并取得了巨大胜利，收复了被俄国侵略者侵占的雅克萨城，赶走了侵略者，同时，将东正教堂和修道院加以拆除。俄国东正教侵华的活动，暂时被制止。

中国军民在雅克萨城，胜利地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在战争中先后俘虏了俄国人约二百名。在清朝政府的宽大下，经过遣返被俘人员之后，自愿留下的俄国人近百名。这批俄国人被清政府陆续送到北京城，安置在京畿的八旗中的镶黄旗内，地点在北京城东北角胡家圈胡同。他们和满族人一样，享受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过着丰裕、幽静、愉快的生活。在

政治待遇方面，清政府还分别赐给他们四品至七品的官职，得到某些权利。这些最早来北京的俄国人，以及他们的后裔，其中不少人取得了清朝八旗中佰什户等职务，有的还担任了清政府中的重要军政官职，如清朝末年，曾担任陕西总督的升允，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不仅如此，在婚姻，乃至宗教生活等方面，清政府也给他们以特别的优待，专门派人侍候其生活，按时发给春夏秋冬四季所需要的衣物。同时，还允准他们可以与中国人通婚，享受宗教信仰的自由。清政府专门拨给他们一块庙地，以供他们作为进行宗教祈祷活动的教堂。后来，长期居住的俄国人，把这块庙地改建为东正教堂。教堂地址现在北京市东直门内。

公元1692年，俄国为了使其在华进行宗教侵略合法化，建立永久性教堂，曾致函清近侍大臣，“请至圣皇帝降旨，准予中国地方建造教堂。我俄罗斯商人愿于中国建造教堂，如蒙至圣皇帝指给地址，我俄罗斯国君主等，将按价出资建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155—156页）。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清政府明确地拒绝沙俄的无理要求，在咨文中说：“查得西洋各国之人来中国，只是永久居留者曾建教堂，并无于我国续建教堂之例。故此事亦毋庸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154页）。

早期来北京居住的俄国俘虏中，有一个东正教会的司祭马克辛·列昂捷夫（即马克西姆，康熙皇帝曾封赐他七品官职），在他的积极活动下，发展了一些教徒，并进而搜集京都的有关情况。马克辛·列昂捷夫在华的宗教活动，得到了俄国西伯利亚都主教伊格纳蒂·李姆斯基·葛萨阔夫的赞赏。

公元1695年，伊格纳蒂·李姆斯基·葛萨阔夫委托即将来华的商队，特将东正教会证书亲自送给马克辛·列昂捷夫神父，并正式把北京这块庙地所设立的教堂，命名为“尼古拉”教堂，即“罗刹庙”的北馆。（后来改名为俄罗斯北馆。）并且还指示马克辛说：“你被俘虏对中国人不是无益的，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依靠你在他们中显示出来，”你“不单要为沙皇祈祷，也要为中国皇帝祈祷。……以便在中国找到一个真正的立足点”。（阿多拉斯基：《东正教两百年来在中国的传播》，载《东正教之友》1887年3月号，第346—347页，喀山俄文版）。北京“尼古拉教堂”的正式建立，为沙俄向中国进行宗教文化侵略提供了有利条件，创造了前哨基地。

## 二、东正教会在华的任务

俄国政府利用东正教会，“作为对外政策”的有力工具，以更快的速度“打开中国的窗户”（格列勃夫：《北京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载《东正教之光》，第22页），从中窃取更多的权益，销蚀中国人民的革命意志和反抗精神。公元1700年6月29日，彼得一世向西伯利亚行政中心托博尔斯克发出特谕：要求他们在中国发展教徒，挑选精明强干的青年传教士来华，“引导中国皇帝及其亲信大臣和全体居民赞助此项（注：指宗教）神圣事业”。（《1649年以来帝国法令全集》第四卷，第1800号，转引自巴德玛耶夫：《俄国与中国》，1905年彼得堡出版，第31—32页）。同时，他还特别指示来华的俄国东正教士，“逐步地使中国和西伯利亚那些愚妄无知、执迷不悟的人生灵，皈依真正的上

帝”。（《1649年以来帝国法令全集》第四卷，第1800号，转引自巴德玛耶夫：《俄国与中国》第31—32页，1905年彼得堡出版）。东正教士披着宗教的外衣，打着传教的幌子，容易“接近居民，因而较其他职业的人员更便于研究该国情况。他们可以向政府提供从我国（注：指俄国）国家利益看来不可缺少的情报。没有这些情报往往使正确提出纯属政治的问题变得很困难”。（费奥多西：《俄国驻朝鲜传教士团》）。全俄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在给前来中国的修士大司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此人是俄国派驻北京的第七届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团长，或者叫领班）的指示中，就明确地要求他对宗教笃信不渝，在华活动要举止端庄持重，立身处世要符合神圣的修士身份。还要求他们到中国去必须努力学会使用汉语，以利于联络感情，更有效地向中国居民传教授道，接受所谓福音真理。另外，指示他们在接受新教徒入教要谨慎，并尽一切可能，千方百计地使信教的中国人，对东正教义虔诚不移。此外，还要求约阿基姆·西什科夫斯基每年必须向全俄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和所属的教区的主教作出详细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当地居民中领洗的人数、时间，以及受洗人的情况；同时，要开列出新参加东正教人的姓名、身分、年龄等情况。宗务会议对于传教人员应具有的姿态、作风和遵守的规则等等，都作了详细、具体的指示与要求。譬如传教人员在对待汉人和驻在北京的其他民族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谦恭、温和、庄重、沉着，注意尊重和照顾中国各地的风俗习惯。特别提醒团长，要他在赴北京途中和驻北京期间，为执行委任的职务，决不能做出任何与所任的职位和身份不相称、以及和所担负的职位无关的泄密事情。再三强调要严格保守秘密。有

关涉及国家秘密的任何事情，绝对不许在私人信件中透露。要遵照彼得大帝颁发的谕旨所规定的去做。否则，一定要受到命令上规定的惩罚，决不宽恕。如果修士大司祭有机会能与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或其他天主教传教士在任何场所相遇和交谈时，要亲热地对待他们，但同时要保持谨慎；北京教堂于二月份奉献节期间，要举行宗教庆祝活动；在规定的日子里，要为每一个已故的享有盛誉值得后人怀念虔信上帝的沙皇、大公、俄国皇帝和皇室成员举行追思礼拜，为死者祈祷。除上述规定外，还着重要求传教士团在紧急情况下，尽量把当地动态的情报认真详细地写成书面材料，直接上报全俄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尼·伊·维谢洛夫斯基编《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53—58页）。不仅如此，沙俄外交委员会曾明确地指示东正教士，要想方设法地获取“有关中国人的意向和活动的情报”。（郭索维慈《中国人及其文化》，第392页）。对于俄国驻华东正教士团的性质、任务和起的作用，东正教会的大司祭英诺森·涅米罗夫作了最清楚的供认，他不加粉饰地说：东正教会“起着俄国政府的官方代表的作用”，“教会的经费是俄国政府供给的，指示是来自俄国政府的，不言而喻，政府的愿望是通过教会促进俄国的政治利益”。（英诺森：《在华的东正教会》，载《教务杂志》1916年10月号，第678—679页）。日本学者佐伯好郎比较公正地认为，从1727年俄国东正教派出驻北京布道团开始，“俄国东正教会的目的不在于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而是作为沙皇俄国政府的情报机关或外交机关成立的”，因此，“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到清交宗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约一百三十年间，包括上述雅克萨（按：指清军在雅克萨战役中俘虏的俄军）四十五人的子孙（注：

俘虏四十五人系不确实),信徒总数尚不超过二百人;可是,从俄国派往中国的东正教传教士总数,在一百三十年之间竟达一百五十人之多。这一事实,可以如实说明,这些传教士团从事间谍活动而忘掉了传播‘福音’的本身业务;也可以从中想象,俄国传教士在沙皇俄国的对华政策中曾何等活跃”。(佐伯好郎:《中国基督教研究》(昭和十九年版)第三册,第469—470页)。

### 三、俄国东正教会侵华 活动的概况

沙俄在未正式派遣东正教士团来北京前,就充分地利用西方国家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窃取中国的有关情报。公元1675年,俄国特使斯巴法里——米列斯库(尼果赖)在北京期间,曾与充当清政府译员的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斐迪南·维尔比斯特,比利时人)相勾结,窃取了一张中国地图和有关清政府在黑龙江地区的战略计划等核心机密。斯巴法里在北京居住期间,通过耶稣会教士刺探了一些情况:①中国人(注:这里指满人而言)对他的出使感到高兴又不高兴。高兴是因为他们的敌人尼堪人得知俄国朝廷同清政府谈友好,会以为俄国军队可能来援助清政府;不高兴是因为俄国人已经非常接近清朝的边界,并正在建造寨堡。②他在华时不被人看重。③西方国家的耶稣会教士(在华活动的教士),希望俄国能派出军队攻打一下中国,使他们认识一下沙



皇陛下是什么人。④如果俄方不交出清政府索取的逃人根忒木尔，清政府就要攻打阿尔巴津和涅尔琴斯克这两座城堡（注：阿尔巴津即雅克萨，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均为中国的领土，被沙俄侵占）。此外，耶稣会教士表示将乐意为俄国大君主效劳，就象为上帝效劳一样。（见（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52—53页，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公元1688年，俄国使臣尼·达·维细科夫（魏牛高）到北京后，又与南怀仁秘密联络，也从而获得了有关中国的兵力和武器装备等机要情报。公元1689年，中俄举行边界谈判时，俄国特使戈洛文（俄国御前大臣兼布良斯克总督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曾与担任清政府译员的耶稣会传教士张诚（法国人，Jean-Francois Gerbillon，弗朗索瓦·热拉皮翁，张诚是他所用的华名，1687年来中国为天主教耶稣教会传教士。清康熙二十八年即1689年，在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中，担任清朝政府的翻译）和徐日昇（Thomas Pereira，托马斯·佩雷拉清朝初期来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葡萄牙人，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到北京，协助南怀仁修订过历法，康熙二十八年即1689年，以翻译身份随清政府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参加《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与签订）秘密联络，使俄国大得好处。对此，俄国谈判代表戈洛夫坦白地承认：“我们是应该多么感谢你（注：指徐日昇）。你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帮助。我们要让你了解，我是知道你的帮助的，而且我向你保证，不久你将获得同等价值的报答，知道你们的工作在莫斯科产生的结果”。（《徐日昇日记》，第五十六节，1689年9月8日）。耶稣会传教士张诚也在《日记》中毫不掩饰地写

道：俄国使节（注：指戈洛文）“向我们保证他定将竭力请求沙皇优待我们教会派驻莫斯科的人员，以酬谢我们在北京宫廷和这次谈判（注：指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两度为俄国所作的一切斡旋”。（《张诚日记》，1689年9月8日）。

俄国东正教会传教士侵华初期，主要是从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情报的搜集工作，其途径是混入来华的使节团和商队中进行非法活动。从公元1689年9月8日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议界条约》始，至公元1727年，其间三十八年，大凡沙俄派遣使臣和商队来华，一般都配备若干东正教士，混进商队和使臣随从人员之中，到京进行刺探中国情报的阴谋活动。如1697年俄国驻尼布楚城长官萨莫伊尔·费多罗维奇·尼科列夫为请准许商人等来华贸易事致清政府索额图呈文：“兹有于205年（注：就是公元1697年）由莫斯科派出尼布楚连长瓦西里·舍尔辛为该商人等之领队，并派出马弁三人，念经神甫一人，缮写书信之司书一人，通事一人，随同前往。瓦西里及商人等一行，共计一百四十一人。望予接待，拨给栈院，并准其自由贸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181页，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同年，康熙允准俄商来华自由贸易。又如公元1703年，俄驻尼布楚城长官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希什金为俄国官商前往北京贸易事致黑龙江将军沙那海函：“特派巨商伊万·萨瓦捷耶夫及同伴德米特里·鲍热多莫夫、伊万·克留科夫、列昂捷伊·兹维列夫、司书列昂捷伊·季托夫人等……偕同携有俄国货物之商队，由皇都莫斯科前往中国，以便出售俄国货物，购进中国货物。涅尔琴斯克（注：即中国的领土尼布楚城，1658年被俄国侵占后，改名涅尔琴斯克）并派有伊尔

库茨克哥萨克头目阿法拉西·贝顿之子伊万·贝顿及随从官兵五十三人，随同该商人及商队前往。该商人所偕同之商队中，尚有修士司祭谢尔盖、教堂执事费奥多西及一名有家室之神甫与九名工役人等随同前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222—223页）。实际上这次伊万·萨瓦捷耶夫率商队来华，就有九名东正教士混迹其间，到北京以后就与“尼古拉教堂”建立了联系。再如公元1713年，俄国专员格里戈里·奥斯科尔科夫呈送中国至圣皇帝所属蒙古地方赛音汗呈文：“我察罕汗派本商务专员格里戈里·阿弗纳希之子奥斯科尔科夫兼理商务人十名、俄罗斯喇嘛一名、司书三名、通事二名，……共三百人，……由色楞格地方入境”。（中国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第323页）。

沙皇政府为取得东正教士团在华传教的合法地位，进行了许多鬼蜮的活动。公元1702年，沙俄以替换在京活动不便、年老多病的东正教士马克辛·列昂捷夫为借口，要求另派东正教士来京，未能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当时，俄国议政大臣西伯利亚事务衙门秘书长兼罗斯托总督安德烈·安得里耶夫·维纽斯为更换驻北京教士事致索额图咨文：“经奏报贵圣主而在京城敕建立我东正教教堂，因其主持念经等教务之马克希木·列温提耶夫（注：即马克辛·列昂捷夫），如今已年迈眼花，不宜管此教堂事务，现经报闻我察罕汗后，特派本国二名教士，与商人同往中国京城。若蒙大臣怜悯，望转奏圣主，准此二人留住京城，并将我教堂移交伊等居住。望勿阻拦前往中国贸易之商人去该教堂礼拜。再者，贵国既已按例赏赐马克希木·列温提耶夫食用之物，亦望照例赐给此二名

教士。我商人返回时，此二名教士仍留于京城”。（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226页）。清政府于康熙四十三年，即公元1704年拒绝俄国的这一请求，并退回原信。清理藩院在答复中说：“据查，该教堂，乃系由本国与贵国出力建房三间而成，以供其所祀之神。该教堂，由尔国中能念经之七品官马克希木主持念经，并未专设人员，亦非报本院具题后修建之教堂。……今阅为教堂事宜所寄之三件文书，既仍寄送索额图，并不送本院，故毋庸议，应将原文交伊万·萨瓦捷耶夫退回”。（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225页）。不死心的沙俄，又于公元1711年派遣了以彼得·罗季昂诺维奇·胡佳科夫商务专员为首的俄国商队来华，按照彼得一世的旨意，再次向清政府提出另派东正教教士来京代替年老教士的要求，并提出作为交换条件。俄国政府可以同意康熙皇帝之子率领代表团，路经西伯利亚，前往伏尔加河流域，访问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在此情况下，康熙皇帝同意沙俄的这种要求。四年之后，即公元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俄国政府根据沙皇彼得一世的指令，公开正式地向中国派遣了第一个东正教会传教士团。这个团的领班为修士大司祭依拉里昂，还有司祭拉夫伦齐（拉夫连季）、教堂堂长菲力蒙、司祭乌西夫和教堂辅助人员，其中有诵经士奥西普·季亚科诺夫（此人学会满语后，被清理藩院借作翻译，负责翻译俄国枢密院的公文及理藩院致枢密院的公文）等十人。他们随俄国商队于同年5月1日到达北京。清政府定期赐予他们在京的生活费用和粮食，并且还封领班依拉里昂为五品官，封拉夫伦齐、菲力蒙为七品官，其他教会人员为披甲。这个传道团的名称叫北京俄国东正教

传教团，或叫北京东正教总会。这是沙皇亲自批准派遣的第一个神职人员齐备、为数较多的驻北京的东正教传教士团，为以后沙俄派遣东正教教士团来华，打开闭关锁国的清政府的大门，取得在中国自由传教的合法地位铺平了道路。

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9年），第一届驻华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团领班病死后，清政府专门通知俄国政府，并派在京的俄国东正教修士辅祭费里门、披甲格里戈里回俄报告。咨文中说：“为大清国之俄罗斯庙内念经，而曾派遣喇嘛拉里万、拉夫林铁、费里门以及随行之七名俄国斯人，与我侍读学生尹扎纳一周来京城。经奏闻我圣主，业已将尔来京之喇嘛拉里万封为五品官，喇嘛拉夫林铁、费里门封为七品官，随同前来之七名俄国斯人皆命为披甲，并赏给房子、奴才、俸禄钱粮银以及一切食用等物。随同前来之乌西夫等七人，在娶妻时均赏给银两，于我处俄罗斯庙内念经居住”。“兹因尔所派喇嘛拉里万已今年病故，……至于嗣后或尔处另派喇嘛前来，或将该人等撤回之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第399页）。

根据1719年3月30日沙皇的谕旨，便委派近卫军普列奥勃拉任斯克团的列夫·伊兹马洛夫大尉，以特使出使中国。外务委员会为此发给该使臣的训令，其主要内容是：沿途应巧妙地观察中国各个城市和地方的位置、其间的距离、各地的驻军以及这些地区的物产情况；建立对两国都极为方便的贸易关系十分必要，希望准许俄国属民每年均能携带货物前往中国，按自由价格出售，并向中国人购买货物，准其运回俄国；俄方需要在京城设常驻商务代表或领事；在中国停留期间，他（注：指伊兹马洛夫）应探明中国的统治方式和情

况、他们军队的数量和武器装备、毗邻的国家、他们的要塞以及他们同别国所发生的战争和争端。所有这些情报均应作好秘密记录。特别是从中国最好购进什么货物运回俄国于国库有利？能否从中国运出大量金、银、宝石和生丝？通过什么最好的办法才能与中国人建立贸易关系？哪些俄国货物在中国比较畅销？请求准许为驻北京的俄国人修建一座东正教教堂，并拨给一块地皮供建此教堂之用”。〔（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2—1792》第107—108页，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除此以外，商务委员会也同时下达训令：“请求允准前往北京的俄国人不受限制地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拥有自己的教堂、神甫及教堂辅助人员；这些俄国人在北京应有自己的总领事。总领事在中国其他城市还可设副领事”；“该领事和副领事在中国应享有世界上与他们身份相同的人员所享有的一切特权”；“除俄国总领事外，他们不受任何人管辖”。〔（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108、109页，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公元1721年，彼得一世任命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修士司祭英诺森·库利奇茨基大师接替依拉里宛的驻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领班的工作，以扩大东方对东正教的信仰。随同一道去中国的有两名修士司祭、两名修士辅祭、五名教堂唱诗班歌手和三名服务人员。俄国政府规定，每年从西伯利亚省的收入中支取一千五百卢布，作为英诺森·库利奇茨基及传道团成员的薪俸。英诺森·库利奇茨基带着俄国政府的信件，要求清政府准许东正教士团，不仅在北京“自由居住和在教堂主持祈祷仪式”，以利于他们执行宗事务的活动，“而且不阻拦”他们“前往其他凡有人信仰俄国宗教的中国

地方去访问这些人士，特别是“给予这座教堂和该主教及其服务人员和其他信仰耶稣教的教徒以庇护与恩惠”。

（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121页）。上述要求当即遭到清政府的严厉的拒绝。但沙俄对此并不死心，寻找一切机会实现其对华的宗教文化侵略野心。1725年，沙俄派出特命全权大使萨瓦·卢基奇·弗拉季斯拉维奇来华，和中国谈判俄中边界问题，在来华前，俄国政府就宗教事再次向他发出秘密训令：要设法使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司祭英诺森·库利奇茨基调任北京主教，兼管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和尼布楚的教务，秘密来中国；要设法使他具有在北京居住和到各省巡视的权利；要设法使中国政府同意修建永久性的教堂。（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111页，1961年中译本）。

1727年11月2日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恰克图条约》（1728年俄历6月14日在恰克图互换），除取得了在华通商和其它权利之外，还取得了在华传教的特权。这为欧美列强尔后获享自由传教的权益，开了先例。《恰克图条约》是沙俄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条约共十一条，其中第五条规定：“在京之俄馆，嗣后仅由来京之俄人居住。俄使伊里礼伯爵萨瓦·伏拉迪斯拉维奇请造庙宇，中国办理俄事大臣等将协助盖庙于俄馆，现在住京喇嘛（神父）一人，复议补遣三人，来京后居住此庙，供以膳食，与现住京喇嘛同等。俄人照伊规矩，礼佛念经不得阻止。此外，按俄使伊里礼伯爵萨瓦·伏拉迪斯拉维奇之意留京学习外文之四名学生及两名较年长者（伊等懂俄文及拉丁文），则均置于俄馆，由俄皇皇室供其膳费，学成后，即允其如愿回国”。〔（俄）尼古

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391页，1982年11月商务印书馆中文版)。《恰克图条约》的签订，确定了中俄两国在北部的边界，但沙俄蚕食中国领土的野心有增无减。以后，俄国对中国境内的布里雅特蒙古人聚居的地区，进行改当地萨满教、喇嘛教为东正教的罪恶活动。伊尔库茨克的大主教维尼阿明·巴格梁斯基曾说：“接受东正教，在布里雅特人看来就意味着不仅在信仰方面，而且在语言和俄国人生活的各方面要做一个俄国人”。(姆·纳·吉特阔夫：《论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化》，载斯·斯·德米格里雅夫编《苏联历史文献》第3卷，莫斯科版第442页)。这时，东正教士通过各种手段，如减免赋税、赠送日用品、免除其它义务，甚至以官禄为诱饵等等，达到吸引布里雅特蒙古人参加东正教的目的。但这些企图与计划，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于是，沙俄变换策略，采取扶植、利用和控制当地喇嘛的政策。象俄国首次派遣到中国的第一届东正教传教士团，在去北京的途中，路过库伦（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称为乌兰巴托，作为首都）时，按照彼得一世的指示，曾对外蒙第一世哲布尊巴呼图克图罗布藏旺扎布勒三进行拉拢，迫使其改信东正教。这一阴谋活动失败之后，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又对哲布尊巴三世伊什丹巴尼玛进行收买。他们以为“一旦抓住了呼图克图，他的信徒就会毫无困难地遵奉（东正教的）信仰”

（米·纳·巴甫洛夫斯基：《中俄关系》1949年纽约英文版，第16页），结果事与愿违，阴谋也未能实现。公元1727年，俄国还在恰克图河上游一个池塘边上，建立了一节堡（或叫为新特罗伊茨克堡），并在该堡上建立了一个木结构的圣三一教堂。决定派贝加尔地区的附近的主易圣容使节修道院的一名神甫和



几名教堂辅助人员，前往该教堂从事神事活动。不仅来华的有东正教士，而且还有名曰来华学习汉、满语的学生，实则是搜集中国情报的特务分子多人。公元1729年，俄国派遣以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为首，并有神甫伊万·菲利莫诺夫、修士辅祭约阿萨夫和三名神甫，加上前往中国学习汉语和满语的学生格拉西姆·舒利金、米哈伊尔·波诺马廖夫和伊拉里昂·罗索欣一同到达北京。沙俄还发给他们年薪：修士大司祭每年五百五十卢布，神甫、修士辅祭和学生每人每年一百三十卢布。对此，清政府于同年谕令给来华学习汉语和满语的俄国学生指派教师。又如公元1768年初，沙俄派修士大司祭尼古拉·茨维特前往中国，接替前任驻中国的俄国传道团人员，随同有司祭龙斯特和约翰尼基，修士辅祭基弗尔，两名教堂辅助人员谢苗·茨维特和谢苗·基列夫斯基，以及学习中国语言的四名学生。再如公元1780年，俄国又派遣修士大司祭龙斯克·希什科夫斯基为首来北京，同去有两名修士司祭、修士辅祭一名、两名教堂辅助人员和学习的四名学生。

东正教士团来华的初期，清政府在解决他们的居住、修建教堂和生活用品等方面，提供了优厚的条件。以第一届驻京俄国东正教士团为例：清政府发给团长依拉里宛·列扎伊斯基八百两银，修士司祭和辅祭每人六百两银，教堂辅助人员每人二百两银，用这笔钱来购置房屋。除此之外，清政府还专门拨款雇佣女仆为他们服务。并对传教团所有成员每月发给一定数量的零用费：团长和其他宗教人员大月（三十天）发四两五钱银，小月（二十九天）发四两三钱五分银（是每月发给每个人的银钱）。再则，每隔五天清政府专门用大车送给

他们丰富的物品，象鸡、鸭、鹅、羊等。甚至连火柴都由清政府供给。清政府另外指派一名地位很高的大臣，经常探望和关照他们，了解其需要，尽量予以满足。对他们出外还特别加以保护，如这届传道团团团长每次外出，都有清兵两人骑马在前面开道，并有两名清兵在马车两侧负责护卫。

公元1732年，沙皇俄国又在北京玉河桥西东江米巷（即现在的东交民巷），建立了新的永久性的东正教堂，即俄罗斯南馆，把宗教侵略的活动范围扩大了。后来，俄国教会于公元1735年（雍正十年），便将这座教堂命名为“奉献节”教堂，或称“圣玛利亚”教堂，并且隆重地举行了圣化仪式。对于东正教会在北京所建立的教堂情况，连俄国学者也作了详细的叙述：俄国派往北京的信使索洛维约夫中士，在北京一个多月，将搜集的情况密报俄国政府。密报中说，清朝皇帝（雍正）现在不禁止耶稣会教士建筑教堂，不禁止下层中国人信奉东正教，而这些在他即位初期是不允许的。在北京有两个东正教教堂，这两个教堂相距五俄里（注：一俄里等于1068.8米）：一个是圣尼古拉教堂，位于俄罗斯佐领驻地（注：即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清廷将雅克萨战役中俘获的及先后来降的俄国哥萨克中定居在北京的编入此佐领。驻地在北京东直门和安门之间，今苏联驻华大使馆一带），该教堂在1730年由于地震倒塌了，但又在旧址由俄罗斯佐领的人用中国发给他们的薪俸重建起来；另一教堂由中国出资新建在俄罗斯馆附近。（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 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223页，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随着沙俄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方面侵略的步步

加强，宗教文化侵略也日益深化。尤其是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表现得更为突出。沙皇俄国胁迫清政府于公元1858年6月13日和公元1860年11月14日，先后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获得了在中国进行传教的特权，东正教在华的侵略势力日益发展扩大。这两个不平等条约中，就沙俄在华的传教特权，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条约规定：“中国于安分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亦不可于安分之人禁其传习。若俄国人由通商处所进内地传教者，领事官与内地沿边地方官按照定额查验执照，果系良民，即行画押放行，以便稽查。”“俄国人学习中国满、汉文义居住京城者，酌改先时定限，不拘年分。如有事故，立即呈明行文本国核准后，随办事官员径回本国，再派人来京接替”。（见《中俄天津条约》，载《中俄边界条约汇集》1973年3月，商务印书馆编）。条约还规定：“在喀什噶尔中国给与可盖房屋，建造堆房、圣堂等地，以便俄罗斯国商人居住，并给与设立坟墓之地。”（见《中俄续增条约》，载《中俄边界条约汇集》1973年3月，商务印书馆编）。传教内容的条款塞进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是俄国公使最先出的诡计，为各国列强利用传教士，在华进行间谍活动，起了带头的作用。对此，西方学者和传教士也坦白地承认。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供认不讳地说：“第一个提出对这个题目拟订一项条款的人（注：指在华自由传教一事）是俄国公使。紧接着，在把由他起草的条文送与中国官员举行谈判时，中国方面表示同意准许传教士可在中国全境旅行，因为这些人通常都会说中国话”（《卫三畏传》第270页）。米歇（或译为密契）在所著的书中证实：窃取在华传教的特权，是俄国人开的头，美、英、法

等国跟上，他们提出的条款大体相同。（见米歇：《阿礼国传》第223、249页）。

公元十九世纪末期，俄国东正教的反动势力不仅分布在北京地区，而且扩展到华北、东北、华东地区，甚至边远的西北一些地方。特别是中东铁路建成后，东正教的侵略势力便在这条铁路沿线渗透，教堂不断增加。仅哈尔滨、牡丹江、沈阳、旅大和满洲里等地，就修建了一百余处教堂。东正教忠实地服务于沙俄对华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尤其是在中东铁路的枢纽——哈尔滨，加速扩大教会的组织力量，不断地新建教堂。公元1898年，沙俄东正教会在哈尔滨的香坊正式建立了第一个在东北的教堂——尼古拉教堂，次年又在哈尔滨市南岗建立了尼古拉教堂，又称为“南岗喇嘛台。”以后，便陆续地在哈尔滨地区新建了十余处教堂。俄国东正教在华的教区也随之建立，在哈尔滨、上海、天津、新疆等地，建立了独立的教区，以利于宗教侵华势力的发展和活动的深入。据初步统计，从公元1715年至公元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国派遣来华的东正教士团共有十八届，每届传教士团人员（包括来华学习的所谓学生）大约十人左右。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设有包括分堂在内的教堂四十五座，其中直隶（包括北京）有十四座，湖北有十二座，哈尔滨地区十二座，河南、济南、内蒙和外蒙、上海、张家口、大连、满洲里等各有一座。神学院一所，男女学校二十所（培养传教士，继承东正教之业），当时学习的学生共约七百余名。东正教会所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共有四十六处，仅北京一地就开设了一些小工场和小的农场，它包括木材厂、蜡烛厂、肥皂厂、面粉厂、制砖厂、缝衣店，养蜂、养牛场等。俄国驻华

传教士团，通过各种活动接受华籍教徒达六千余人，其中北京、天津两个地方的华籍教徒，就占总数的45%。在蒙古、新疆和其它边远地区，也有不少注册登记的华籍教徒。从东正教会派驻中国的第一届传教士团起，到公元1903年为止，东正教会在华的财产总值达五十多万美元。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华的俄国东正教士团的活动，已不再由政府予以支持。但是，俄国大批的富农、资本家、官吏和皇室成员逃入中国境内，和在华的东正教会反动势力结合在一起，在国际反动势力的支持和鼓动下，东正教会在华的阴谋活动又死灰复燃。从1917年至1938年，仅东北地区就增设了四十四座教堂，教徒人数从1898年的几百人，至1922年猛增到三十万人。天津地区，在1917年以后，建立了五座教堂，教徒达五千多人。上海也建立了教区，在1933年用了几百万元修建了庞大的圣母大教堂。北京传教士团于1923年后，到山东青岛进行传教活动，并在那里建立了索菲亚大教堂、圣鲍切诺夫斯基教堂和崂山疗养院。在西北的新疆地区，到1931年以后，教徒约有一万人。

俄国派遣来华的东正教士团和随团的人员异常之复杂，有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有医生、学者、学生，有俄国外交部的政治官员，还有俄国总参谋部的军官，也有海军将领和俄国中东路的督办等等。如公元1860年前后，曾任俄国驻北京东正教士团监护官的彼得罗夫斯基，回国后任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又如任俄国驻京第十一届东正教士团的监护官拉狄仁斯基，来华前是我国总参谋部的上校军官。再如曾在北京传教士团中任过顾问的有：俄国中东路督办霍尔瓦特上将、郭尔伯夫海军少将、驻法国高级外交官瓦西里列夫

斯基，还有曾任过北洋政府财政顾问的俄国高级文官戈沃洛夫和律师列贝夫。在第二十届传教士团中，负责掌院大司祭那发那伊勤和甘魏拉伊勒以及修士大司祭尼古拉等人，都是俄国的白匪军官，修士大司祭萨多克就是一个俄国的警官。

俄国东正教会的反动势力在中国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从东北地区的哈尔滨、长春、满洲里、沈阳、旅顺、大连，到华北地区的北京、通州（今通县）、涿县、房山、永平、古北口、北戴河；从中国北部的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到重要的港口城市天津；从西北边疆的重要城市乌鲁木齐到有悠久历史的古都西安；从山东半岛的青岛到华东重要城市上海以及中南、华南的汉口、广州，都是俄国东正教士活动的地方。沙皇俄国在侵略中国长达两百多年的历史 and 霸占大片领土的过程中，东正教会是一支得力的力量。对于沙俄侵华的恶劣行径，革命导师恩格斯作了透彻的揭露，他尖锐地指出：俄国“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幌子。”（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页）。

## 四、俄国东正教会在侵 华中的地位与作用

### （一）直接参与策划对中国的军事侵略

沙皇俄国对中国进行无论是政治、经济侵略，还是文化、宗教的侵略，都是以军事侵略为先导，并以此作为实现其

它方面侵略和鲸吞中国领土的主要手段。象俄国大主教英诺·涅米罗夫,就是一个积极参与策划对中国实行武装侵略的急先锋。英诺森·涅米罗夫,俗名是伊凡·叶夫谢耶维奇·波波夫,生于公元1797年,死于公元1879年,他出生于一个宗教家庭,任过阿留申群岛和堪察加教地区的主教、大主教,又任过莫斯科都主教、俄国东正教传教会主席、莫斯科名誉理事、科学院名誉院士等职。他是俄国派遣来华的第十二届东正教士团的首领。他在华期间,于公元1847年亲自参加以穆拉维约夫为首的武装侵略军,对中国黑龙江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不仅如此,他于公元1853年,非法侵入黑龙江地区,以传教作掩护,进行搜集各种情报的阴谋活动。随后,他还派遣其儿子加甫利尔司祭,直接参加俄国所谓考察队,出没在黑龙江地区,大肆进行情报的搜集活动。次年,英诺森又一次闯入黑龙江地区,在当地居民中进行征服人心的鬼蜮活动。他为着活动的方便,特地将做东正教礼拜的讲坛,从伊尔库茨克搬迁到中国黑龙江流域的海兰泡,并且还担任俄国殖民当局在此地设置的民政顾问要职。他先后六次在黑龙江地区东窜西出,频繁活动,把沿途所搜集的重要情况汇集起来,写了关于武装占领黑龙江地区的报告——《阿穆尔纪行》,送给沙俄扩张主义分子穆拉维约夫。英诺森在报告中提出:把中国的内河——黑龙江流域划归俄国,并狂妄地要重新划定俄中边界。他还向俄国政府献策:俄国占领黑龙江地区以后,应该及时地将俄国人“移民”到黑龙江;具体移民到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建立俄国的港口和船舶修建,及其它设施等等方面,他都作了明确、详细的说明。同年,在沙俄侵略军准备侵犯黑龙江前夕,东正教传教士在伊尔库

茨克附近的东正教堂上，竟然公开写着：“拿下阿穆尔（即黑龙江），守住这边疆！蒙古，勿开口！中国，莫争辩！对于俄国，北京也并非遥远的地方！”（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第364—365页）。为了加紧对黑龙江侵略的情报搜集工作，公元1856年2月29日，俄国东正教最高宗务会议批准英诺森在黑龙江下游建立了两个传教士团。

除了英诺森之外，还有一个积极参与军事侵略黑龙江地区的东正教博士——帕拉季·卡法罗夫（又可译为巴拉第·加法罗夫），他是俄国派驻北京第十三届和第十五届东正教传教士团的首领。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利用各种手段与途径，搜集了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情报。他于公元1856年6月和12月，多次送给沙俄外交部亚洲司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情报。在情报中，他分析了当时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形势，和清政府的情况，提出了割占黑龙江流域的要求。他在报告中说：“当我们得以放手大干的时候，我们的行动理应更趋明确，我不再对阿穆尔（注：指中国的黑龙江）左岸的归并有所怀疑。自由航行只是一个不彻底的办法，这样办事既不方便，又很缓慢。中国是一个固执的老头子，他喜欢有人来安抚他，所以也才忍受一切让步。在我看来，事情可以悄悄地办好，不过得采取行动才行。”

（瓦西里也夫：《外贝加尔哥萨克》第3卷第91页，1918年赤塔出版）。由于英诺森的情报策划和帕拉季及时地向俄国政府提供了“十分详尽的关于中国事态的情报”（卡巴诺夫：《黑龙江问题》），促使俄国政府加快了侵占黑龙江地区的步伐，并为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璦琿条约》作了充分的准备。

扩张主义分子穆拉维约夫根据东正教士团团团长英诺森和



巴拉第提供的情报与献策，再加上由他亲自组织的“考察队”和“调查队”所窃得的黑龙江地区的情况，详细地制定了一个强行武装航行“黑龙江的计划”——实际上是一个武装侵略黑龙江地区的计划。为了加快这个侵略计划的实现，穆拉维约夫在给沙皇政府的报告中，心急如焚地说：“目前中国的内乱（注：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正是开辟黑龙江航线的大好时机，而三年来我们在黑龙江活动的顺利和安全，更是取得进一步成功的可靠保证。”（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107页，莫斯科1891年出版）。当沙皇政府亲自批准了这个侵略计划后，东正教修士大司祭英诺森立即赶到伊尔库茨克，同穆拉维约夫紧急地进行密商，讨论即将并入俄国版图的阿穆尔省（注：即黑龙江地区事宜。与此同时，穆拉维约夫提出在黑龙江地区居地的费雅喀人（即中国的少数民族）中设立东正教士团的建议时，英诺森立即表示同意，并愿竭尽全力付诸实施。穆拉维约夫为了保护东正教在华侵略活动的扩展，特别还派遣一名中校军官陪护英诺森一起活动。英诺森直接地参与1858年穆拉维约夫率领侵略军，用武力强占黑龙江北岸的中国领土，同时，他还陪同俄国谈判代表穆拉维约夫到瑷珲，同清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又胁迫清政府派驻黑龙江的将军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沙俄霸占了中国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的大片领土；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中国领土则由中俄共管，这为以后俄国进一步霸占中国领土埋下了祸根。为了奖赏英诺森在侵略中国的活动中所给予的最积极赞助，俄国政府将英诺森经常出没的中国领土——海兰泡，改为俄国名称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英诺森以前曾担任过伊尔库茨克

的圣母报喜堂的主教)。公元1858年5月9日,在英诺森的亲自主持下,在中国的领土——海兰泡举行了东正教堂建立的奠基仪式。后来,这个侵华有功的英诺森,被提升为莫斯科都主教。对于英诺森在参与俄国军事侵占中国黑龙江地区所起的作用,当时担任堪察加驻军司令的扎沃伊科不得不承认,“在黑龙江流域发生的重大事件,无不受到英诺森的积极支持,他的生动的话语”,是对俄国侵略扩张“事业的热情支持”,他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巴尔苏科夫:《莫斯科和科洛姆纳教区主教英诺森》)。不仅如此,沙皇俄国为了奖励其他东正教神职人员的侵华“功绩”,便把新侵占的中国的大片土地赏赐给他们。1859年,俄国政府特地颁布了一个“阿穆尔地区保障与安顿神职人员生活条例草案”,其中规定神职人员可由“国库支付薪俸”,每个乡村司祭可以取得八十俄亩(注:一俄亩等于16.388市亩)的可耕地作为庄园、草场等。东正教会还在黑龙江北岸建立了两个东正教堂,即马林斯克教堂和扎依的圣索菲亚教堂。再如任东正教驻北京的第十一届传教士团监护官拉狄仁斯基,就利用传教士的公开身分,闯进中国黑龙江地区,一直到雅克萨城,刺探当地不少情报,回国后向俄国政府报告,颇受赏识。象在前面提到的第十三届和第十五届驻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团团长帕拉季,在中国进行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他在中国前后活动了十三年之久,亲自参加了对东北、蒙古地区的实地调查,向沙俄政府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和历史背景材料,其中不少具有相当价值。如公元1870年他伙同纳赫瓦利赫,一起对东北地区进行了地形测量,东至伯力、海参崴,北至海兰泡、齐齐哈尔,南至沈阳,以及乌苏里江一带。除此之外,还搜集、整理了有关我

国东北地区的重要海港、海湾情况，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从北京经满洲里到海兰泡的旅行记》和《乌苏里江地区历史概要》等书，直接为沙俄武装侵略中国东北边疆政策服务。对于东正教在沙俄对华侵略中所处的地位与起的作用，恩格斯作了深刻的揭示，他指出，沙俄利用东正教“征服别的民族，吞并左右邻邦的领土。”（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82页）。

## （二）东正教士团在华的政治侵略

俄国东正教士团是沙俄对华进行政治侵略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帮手，而传教士则是直接刺探中国情报的特务分子。俄国未正式派遣传教士来京前，就利用在华的西方天主教耶稣教会传教士窃取情报。

自俄国正式派遣东正教传教士团来华后，搜集情报的活动日益频繁。首次来华的东正教士团团长伊拉里宛·列扎伊斯基，施展多种手段，包括欺骗、利诱等，拉拢清朝官员，或者出入大街小巷，利用各种机会索取清政府内部的机密。俄国传教士和随团学生在华的特务活动，逐渐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当时担任俄罗斯馆御史的赫庆，就于1737年在向清政府的奏折中说：俄国“在京读书子弟亦不可任其出入，使知内地情形。輿图违禁等物，禁勿售与。”（何秋涛：《朔方备乘》第十二卷，《俄罗斯馆考》）。

1781年，沙俄外交委员会指示岳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为首的驻京东正教士团，要想方设法搜集“有关中国人的意向和活动的情报”。（郭索维慈：《中国人及其文化》第392页）。同时，俄国圣务院（是俄国东正教的最高权力领导机构）也向

这届传教士团下达任务，要求他们迅速地报告中国当地的各方面情况和动态。1818年8月4日，俄国政府指令在华的东正教士团：“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布拉科夫：《十九世纪上半叶俄中关系史的一项》，《苏联东方学》杂志，1956年第二期第101页）。这些传教士将搜集的中国各种情况，及时地向俄国政府报告。譬如俄国驻京的传教士吉明，在写给沙俄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在中国首都北京没有俄国的代表（注：指当时俄国政府还没有正式在北京设立官方外交机构和代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才正式建立使馆，并派遣驻华使节或代表），但是俄国的修士大司祭代替了他（注：指俄国政府的代表），与理藩院（注：理藩院系清朝中央政府掌管蒙古、西藏、新疆各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机构）建立了联系。每逢盛大节庆和宗教节日，理藩院的官员和其他部门的大人先生们，便到俄罗斯馆来观赏宗教仪式和各种装饰。”（《中国福音报》）在俄国政府还未派遣常驻中国使节时，在华的东正教士团，事实上起到了俄国官方代表团的政治作用。这些俄国传教士在取得清朝中央官吏的信任以后，就可以自由出入清朝政府的重要机关——理藩院。不仅如此，随驻京东正教士团来华学习汉语、满语的所谓“学生”，竟然也可以随便来往于理藩院，并担任理藩院的翻译，甚至还亲自“帮助”中国官员处理日常外交事务，这就为俄国窃取清政府内部核心机密创造了极其方便的有利条件。第二届驻京东正教士团随团学生罗索兴，1738年充当了清政府理藩院的翻译以后，就利用其工作之便窃取了一份中国详细地图，交给沙俄来华特使郎克，转至俄国枢密院。

由于罗索兴搜集情报有功，获得准尉军衔和每年一百五十卢布的奖金。鲁索兴从理藩院偷窃了几十种重要情报，这可从他编译的一部分情报资料目录中证明。他编了《中国当局各王简史——他们的姓氏、统治年代及值得纪念的一些事件》、《满洲诸王、满洲军队秘密驻地、首都北京情况、满洲军队表册》、《中国政府所属城镇、白银和粮食生产表格》等等。（帕·伊·斯卡奇科夫《俄国中国学简史》197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7—48页）。这个所谓“学生”于公元1740年回国后，就在俄国科学院从事汉、满文的翻译工作。他将在华期间所搜集的情报编译成书。如他和随第三届东正教士团来京的学生阿·列昂捷夫合作共同翻译了《八旗通志》。他们在译注中，将有价值的情报如十七、八世纪满族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的情况，向俄国政府报告。他们这些在华的情报活动和提供的材料，对俄国侵略扩张有很大的帮助。因此，1762年8月7日，俄国政府授予阿·列昂捷夫以省秘书的职务和四百卢布的奖金。而鲁索兴的遗孀（此时鲁索兴已死去）也得到了六百卢布的奖赏。以后，列昂捷夫便留在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身边，直接为女皇起草“圣谕”。

曾任过清政府理藩院翻译的俄国传教士团的随团学生伏拉迪金和贝科夫，他们离华时带走了不少对俄罗斯帝国有用的机密情报。1756年，伏拉迪金再次带领商队来华，伙同在京的东正教士团人员，用一千五百卢布买通了清政府的管理人员，非法地复制了一套中国各个行省和京师地图，送交俄国枢密院，以供秘密考察之用。（索洛维约夫：二十九卷本《俄国史》第十二分册，第390页，1964年莫斯科俄文版）。为了加强对华的情报搜集工作，从1807年起，沙俄外交部正式委派一名

监护官随同传教士团来华。(监护团的军官,是沙俄政府派驻东正教传教士团中的“世俗事务”官员,实际上是做谍报工作的头子,一般是从军官中挑选)。如第十一届东正教士团来华时,沙俄政府又专门派遣一名军事人员(原沙俄总参谋部上校)担任“监护官”。从此,“北京东正教士的工作和生活,事无大小都成了俄国外交部关注的对象”。(帕雷:《在华的俄国东正教士(1689—1917)》,载《美国太平洋历史评论》1904年第4期,第9卷第404页)。

俄国政府派到中国的东正教士团人员,所搜集的情报是多方面的。象第六届传教士团的随团学生巴克西耶夫,将在华期间所窃得的情报资料,回国后专门编辑了一本《1772至1782年清帝国的秘密活动、意向、事件和变化纪要》,及时地向俄国政府提供。又如第九届驻华东正教士团领班俾丘林,在北京活动期间,窃取了大量有关中国的历史、地理、民族、宗教、风俗等资料。此外,他于1817年绘制了一幅完整的北京城郭平面图。图上记载着北京城墙高33.5尺、上宽50尺、下宽62尺,市内大街十六条,桥梁三百七十座,寺院七百所等详细情况。后来,他将这幅地图献给俄国科学院,并且还当上了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俄国外交部就密令驻华传教士团,尽快搜集此次战争的有关情况。当时担任第十二届驻华东正教士团领班、修士大司祭的波利卡尔普·图加里诺夫(又名佟正笏),在来华前,沙皇尼古拉一世特予以召见,并赐给勋章和十字架。他得到沙俄政府“前所未有的信任和权力”。(维谢洛夫斯基:《北京俄国传教士团史料》第50页)。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过程中,他把刺探到的中国的大量的有关战争和条约谈判及签订的情报,立即报告

了俄国政府，因而受到东正教会的赞扬。正如曾担任哈尔滨俄国圣乌拉吉米神学部神学教授的格列波夫所披露：“他的情报内容总是极为详尽。……他不断分析中外定期刊物的内容，注意观察和搜集中国政府和社会的动态，了解外国人的情绪，所以对当时中国的局势观察入微，历历在目。他将这一切都上报圣彼得堡外交部，从而制定了外交部的行动路线。……正是通过他，俄国政府才获得了签订对中国可耻的南京条约，以及有关审讯和处死中国官吏的情报”。（格列波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载《东正教之光》1935年哈尔滨俄文版，第24页）。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驻京的俄国东正教第十三届教士团领班、修士大司祭帕拉季·卡法罗夫（或译为巴拉第·卡法罗夫），经常保持同俄国政府和东西伯利亚总督、侵华急先锋穆拉维约夫的书信往来，报告和传送了当时许多关于中国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军事活动。为此，帕拉季·卡法罗夫于公元1856年6月间，专门写了四个报告，送交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公元1858年4月下旬，帕拉季·卡法罗夫赶到渤海与俄国驻华公使普提雅廷会晤，汇报了在京所搜集的情报。5月间，帕拉季又到天津大沽向俄国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此时，俄国公使即令帕拉季前往英舰，向英军司令提供清政府的情况，其主要内容是：当时北京城缺粮，清朝皇室计划逃跑，北京和天津之间清政府部署了约有一万清军驻扎，以及白河有哪些地方已被清军封锁，大沽口设防情况等。（英国《兰皮书·有关中国事务的信件，1858年4—5月》第23页）。帕拉季还特别提醒俄国驻华公使普提雅廷：“中国人

熟知所谓坚壁清野的防御战法。敌人直到北京都找不到粮食和运载牲口，中国人可以利用沿海平原的低下地势，决开渤海和海河堤坝淹没其一部分；而停泊在海河上游的四、五千只帆船是进行火攻的丰富储备。”（帕拉季：《日记》第24页，转引自帕·叶·斯卡奇科夫《从传教士到大学》，载《远东问题》1975年第二期）。帕拉季把沙俄政府恫吓性的意见传给清朝政府，并且又多次向清朝理藩院施加种种压力，逼迫清政府接受沙俄和英法列强的苛刻要求。帕拉季在华所进行的一系列阴谋活动，为清政府所察觉。清朝政府在一个公文中写道：“至喇嘛巴拉第及学生哈喇坡裴擦启（注：即赫拉波维茨基）……欲至河口相见，已由该衙门派员护送前往。至两国事，有两国大臣商议，该喇嘛等回京，毋令与闻其事，方与体制相合。”（《清文宗实录》卷248，咸丰八年三月甲午）。在军事和外交的双重压力下，沙俄便抢在英法侵略者的前头，于1858年6月13日，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不仅如此，帕拉季还有恃无恐地窜到中国蒙疆地区，搞了许多实地的调查，搜集了不少当地情况，并写了一系列的著作，以供沙俄侵略者的扩张需要。在他写的《1847—1859年蒙古旅游记》一书中，竟捏造事实，散布谎言，胡说在库伦和恰克图之间的地方，“俄罗斯人曾经是那里的主人”，为沙俄吞并外蒙古制造舆论。还是这个帕拉季，在中国创办了定期刊物——《汇报》，竭力鼓吹侵略中国的论调。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中国大地兴起之后，又是这个帕拉季多次向俄国外交部“亚洲司详细报告中国事态”的“密封公文”。（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第45页，莫斯科1891年版）。由于帕拉季侵华非常得力，俄国外交部评价他是一个“很有外交手腕”的



能人。（巴尔苏科夫：《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2卷，第90页）。

随第十三届东正教士团来华的医生米哈伊尔·达尼洛维奇·赫拉波维茨基，就直接地参与了《中俄天津条约》的起草、谈判和翻译工作（此人也是《中俄璦琿条约》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俄国政府为了加强对中国气象情报的搜集工作，将1849年在华建立的观象台进行扩建，并每年拨给该台三千卢布的活动经费。曾在这座观象台工作过的第十三届驻华东正教士团随团学生叶·斯卡契科夫，仅在1853年一年之内，就向俄国天文台提供了长达二百三十一页的中国气象情报。

（《太平天国起义日子里的北京》，斯卡契科夫的北京“日记”，第17页）。他还经常活动在北京的茶馆、街巷、郊区农村，搜集各行各业的人口和农村的地租等方面的情况，并写了《北京郊区的乡下游艺》、《中国天文学的命运》、《中国人的水师事务》、《中国食谱》等书。由于他盗窃中国情报有功，很受沙俄政府的赏识。公元1857年，俄国外交部提升他为八等翻译官。两年之后，又任命他为驻中国新疆塔城领事。1867年又任命他驻天津总领事、兼管各通商口岸有关事务。此外，他又向俄国政府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为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提供了方便条件。因此，颇受俄方代表巴布科夫的夸奖，并看成是俄国的“真正财宝”。

在《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前后，俄国派驻北京的第十四届东正教士团团团长、修士大司祭固礼·卡尔波夫（注：有的书译为固哩或古礼，他是1859年来华接替上届帕拉季，任俄国驻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团长。）曾向俄国政府献策，竭力主张派遣一支由两千人组成的俄国侵略军迅速进驻中国，形成

大军压境之势，迫使清政府屈服，答应俄国提出的苛刻要求，使沙俄在华攫得更多权益。在英法侵略联军再度向北京进犯时，东正教传教士团头目固礼，于1860年7月向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密报：“清政府极度虚弱”，“惊恐万状”，“清政府集结兵力共五万七千人，其中三万人驻大沽，五千人在山海关，北塘毫无戒备”等重要情报。（阿·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二章，1902年旅顺版）。英法联军得此情报，于8月初避开了设防的大沽口，而在清政府“毫无戒备”的北塘登陆，从侧面攻陷了大沽口。8月下旬，固礼又向伊格纳提耶夫报告，清军“僧格林沁正在通州集结重兵，皇帝的全部重炮已从北京调往天津，并在京城内和京津之间的道路上部署了大量的步兵。”（阿·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82页，1902年旅顺版）。俄国公使得此情报，及时地转告英法联军首脑，并建议他们“尽快进入通州，不使僧王（注：指僧格林沁）在这个城市有设防的时间”。（阿·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二章，1902年旅顺版）。还是这个东正教传教团头目固礼，偷偷地绘制了北京城防和清朝兵力的配备情况的地图，送给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正当英法联军准备进犯津京地区的重要时刻，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通过使团中的东正教士，用金钱买通了一个中国和尚，潜入北京探听动向。这个和尚回来后，便向他们报告了北京城内清军的部署和清帝、后妃逃往热河，以及英法被俘官兵等情况。（阿·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113页，1902年旅顺版）。俄国公使将传教士头目固礼提供的一幅军事机密地图，直接向侵略中国的英法联军头目送去，并为其攻打北京出谋划策。俄国的这一举动，博得英法两国政府和军事头目的高度赞赏。如英国侵略军头

目奥勒左坦白地说过：“这张地图比我们自己的更好，更详尽，它把所提供的有关北京的全部情报给了我们。”（阿·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三章，1902年旅顺版）。

俄国驻京东正教传教士团领班固礼，于1860年5月，直接受命俄国驻华公使伊格纳提耶夫的指示：要密切注视与俄国以及其它欧洲列强有关的一切情况，尽量搜集关于时局的情报；要向中国清朝政府说明，俄国无意利用中华帝国的困境，恰恰相反，俄国完全保持中立地位，竭力防止欧洲人对清朝政府施加影响；要竭力传播对俄国有利的新闻和消息，并尽可能根据俄国政府的需要加以解释；要尽可能经常向彼得堡、东西伯利亚总督和伊格纳提耶夫发送有关时间的报告。如遇到重要情况，可借口有俄国的公文需要送交，从教会中派一人来向伊格纳提耶夫报告；如若中国政府要求教会离开北京，你（注：指固礼）可以宣称，由于没有俄国驻华公使的相应指令，你不能擅自执行这一要求，并且无论如何你要清朝皇帝对此事发出谕旨（阿·布克斯盖夫登：《1860年北京条约》第58—60页，1902年旅顺版）。与此同时，固礼在俄国政府的授意下，积极活动，并为俄国公使打着“调处”中国和英法列强军事冲突的旗号，从中捞到更多的权益而四处奔走。固礼于1860年8月，在给清政府的呈文中假仁假义地写道：“本国与中国和好二百余年，今见英国由天津动兵，乱至通州，心觉不平，情愿帮助贵国说合，令伊息兵。”（中国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下册，第989页，中华书局1979年北京版）。在英法侵略联军的强大压力和沙俄公使软硬兼施“调处”下，清政府于1860年10月24日和25日，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续增条约》（北京条约）、中法《续

增条约》(北京条约),英法列强从中国窃得了如下权益:开天津为商埠;准许英法两国招募华工出国;割占九龙司地方一区为英国占有;将以前被充公的法国天主教产业发还,并任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把在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增加为各八百万银两。随后,俄国政府借口“调停有功”,并应受到酬报,向清政府提出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的蛮横要求。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沙俄的胁迫下,于1860年11月14日签订了中俄《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条约共十五款,其主要内容为:将《璦琿条约》规定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中国大片领土割归沙俄;沙俄的魔掌进一步向南延伸,把吉林整个滨海地区全部吞并了;规定勘分东部和西部边界;规定交界各处允许沙俄商人免税贸易;准许沙俄在库伦、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馆;开放喀什噶尔(今喀什市)为商埠等。通过条约,沙俄又从中国掠夺了乌苏里江以东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而为沙俄对华进行商品侵略和把侵略势力扩展到蒙古、新疆创造了方便条件。俄国驻华公使伊格纳提耶夫,对驻华东正教士团领班固礼的活动予以高度的评价,他说:“修士大司祭固礼对汉语、满语的精通,不只一次使他摆脱困难处境,而大司祭对中国当局心理和政策的了解,使他的行动得以沿着真实的、正确的道路前进。……在上帝的保佑下和在修士大司祭的建议下,……有可能同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使得俄国得到乌苏里一带的广大地域和很多在中国的特权”(格列勃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载《东正教之光》1935年哈尔滨出版,第22—23页)为着使已先后签订的条约尽快地生效,俄国政府专门派遣一名东正教教士彼得罗夫斯基坐镇北京,授权办理同清

朝政府交换1858年5月28日签订的《中俄璦琿条约》和1860年11月14日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还必须提到的，第十二届俄国驻京东正教传教士团随团学生伊·伊·扎哈罗夫，（他担任过俄国驻伊犁总领事。）他是在1864年10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主谋”。（《筹办夷务始末》，同治二年六月乙酉）沙俄通过这个界约和《北京条约》的规定，霸占了中国西部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以及其它领土的面积，总数达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

### （三）积极参与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俄国驻北京东正教士团，是俄国商业资本的商务情报员和俄国政府进行经济侵略的得力助手。早在公元十七世纪末叶，俄国政府派遣多起商队来华，打着同中国进行经济贸易交往的旗号，同在北京的东正教士团相勾结，狼狈为奸。这些传教士充当俄国商队的向导，并向他们提供在华搜集的经济情况。而俄国来华的商队又成为东正教士团传递各种情报（其中包括重要的经济情报）的桥梁。“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中国市场对于俄国的国家和私人商业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曼考尔：《俄国和中国》第33页）。

中俄《尼布楚条约》缔结以后，俄国政府派遣来华的商队逐步增加，人数也是一次比一次多，甚至一次竟达几百人。随着中俄两国经济贸易的不断增长，从俄国输出到中国的商品总值不断上升。1691年为七千五百六十三卢布，1693年为二十四万卢布，增加了约三十二倍。“俄国……对于它在远东的经济利益最为重视的，而它在1689年与北京进行交涉中已经获得了这一重大的报酬。”（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25页）。

在1689年前，沙俄只有四个商队到达北京，在此后的二十年内，到达北京的沙俄商队多达十个。它们从中所获得的利润也是很高的，从1705年至1709年，仅彼得·库狄雅柯夫率领的第五次商队，就获利润二十七万卢布。随之而来的是私人行商，甚至走私者不断越过边境，到中国的蒙古库伦地区进行贸易。在库伦，这些私商贸易的数额，据郎喀在1721年的估计，就超过官方商队贸易额的四、五倍。（《1716—1719、1722年由俄国圣彼得堡至亚洲各地的旅行》，见皮克顿：《世界游记汇编》第七卷，1811年伦敦版，第456页）。沙皇政府为了在华攫取更多的财政收入，积极地谋划实现变中国内地为沙俄原料基地和销售市场。

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为俄国扩大对华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沙俄在恰克图贸易中的周转额，每年约在五十万到六十万卢布之间，五十年代初期每年可达八十万到九十万卢布之间。尤其是到十八世纪下半期，单单通过恰克图进行的中俄两国的贸易，就占俄国整个对外贸易的7%至9%，并占俄国对亚洲贸易的67.6%。1756年的贸易额是六十九万二千零二十一卢布，沙俄征得的税收是十五万七千卢布；1759年贸易额是一百四十一万七千一百三十卢布，沙俄征得的税收高达二十三万卢布。当时中国输入俄国的物品主要有：茶叶、丝绸、棉织品、烟叶等；俄国输入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皮毛等。1800年俄国输入中国的皮货，就占整个对华出口货物的70%。沙俄外交部一再指示驻京东正教士团人员，注意对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中国人家庭生活情况的搜集工作。由于沙皇俄国充分利用与中国毗邻的地理位置和其它有利条件，扩大对华贸易，推行

经济侵略的政策。所以，沙俄在华贸易的规模，和所得到的超额利润，尤其是在《恰克图条约》签订以后，和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占据着相当的优势。正如马克思所说：

“俄国人自己独享内地陆路贸易，成了他们没有可能参加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看来，在内地贸易中，他们是不会有竞争者的。”“同时，同中国的这种贸易也为俄国的制造品打开了在别处找不到的销路。”（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10页、第11页）十九世纪上半期，对沙皇俄国来说是“恰克图贸易的黄金时代。”（柯尔萨克：《俄中通商关系历史统计概览》，第165页，1857年喀山版）。

在对华贸易中，沙皇俄国通过不等价交换和其它手段，给俄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以弥补对外战争的军费开支和财政收入。在此情况下，俄国外交部曾多次向驻京东正教士团发出指令，要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内购买能力，以及对俄国产品的需求情况，并及时报告。公元1836年7月3日，俄国驻北京第十一届东正教士团领班、修士大司祭维尼阿明·莫拉切维奇，在给俄国外交部的报告中称：俄国的呢绒每尺（注：指中国的市尺）售价很难达到白银二钱。俄国呢子每俄尺（注：每一俄尺等于0.71米）现售价白银三钱，尚能寻到买主。此外，这个传教士团领班还主动地向俄国政府提供了北京和其它地区需要大量俄国镜子的情报。他说，从广州到北京的镜子价格高，俄国应及时向中国出售镜子及同类的货物，这样就可以有厚利可图。仅就这一情报的提供，给俄国政府和私商带来莫大的物质利益。如在恰克图一地，俄国商人在1843年至1847年的四年中，总共出售俄国镜子比1843年的前四年的总和增加了三倍多，所获得

的利润可想而知。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俄国为了扩大对华输出商品的数量和品种,将国内生产的一些样品,寄给驻北京的东正教士团,征求意见,从而获取商品信息,了解在华销售俄国商品的市场情况。当时,驻京的俄国第十二届东正教士团,在领班、修士大司祭波利卡尔普·图加里诺夫(又名佟正笏)的组织下,四处探寻在京的有关情况,并立即向沙俄外交部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国内生产的布,其质量和宽度是好的,但花色品种不多样,不合乎中国人的要求和标准。报告又着重提到,中国现在需要俄国生产的平纹细布,而对俄国生产的印花布的需求量不多。因此,从1845年到1847年的三年间,俄国在中国就大量倾销平纹布,其价值由五千零九十一卢布,猛增到四万六千五百六十七卢布,几乎增加近十倍,所获得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

这个东正教士团的领班佟正笏,不仅积极为俄国政府和资本家提供经济情报,而且积极地为俄国政府出谋划策。他曾向沙皇政府建议,在新疆地区开辟新的贸易市场。其目的有利于排挤英国和其它列强在该地区的势力,企图实现独占西部市场,窃取更大的经济、政治上的特权。这一主张立即得到沙皇政府的批准,并予以实施。俄国外交部派遣亚洲司副司长柳比莫夫,亲自到中国新疆地区的伊犁和塔城两地进行实地调查,弄清俄国商品在这些地区销售的情况,特别是调查西北地区的省和西藏商品销售的详细情况,以及这些地区贸易交通、运输等情况。这个侵略分子在西北活动中,将搜集的各种情况详细地报告俄国外交部。报告还提出侵略中国西部地区的具体方案:要尽快地开辟西部地区的贸易市场,



特别是要着重解决伊犁、塔城、喀什噶尔地方的贸易问题，并要挟清政府承认俄国在这些地方应享有特权。随后，俄国外交部指令驻北京东正教士团的领班佟正笏，正式向清朝的理藩院提出上述要求，进行交涉，强迫清政府同意。沙俄的无理要求为清政府所拒绝。对此，沙俄并不甘心，派遣武装商队，偷偷摸摸地窜进喀什噶尔等地。同时，又直接派出一支侵略军占领西部一些地方。到1847年7月，沙俄又指令东正教士团领班佟正笏，再次向理藩院提出，在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等三个地方准许俄国通商。这一侵略要求，又为清政府所反对。沙俄并未善罢甘休，紧接着在同年底，向佟正笏发出指示，对清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并施展经济贿赂的手段。指示中坦白地说：“为了你的成功，你不应吝惜礼品”。（罗日科娃：《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沙皇政府在中东的经济政策和俄国资产阶级》，第342页，1949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1848年6月，佟正笏再一次向理藩院提出以前曾被拒绝的苛刻要求。在沙俄的政治压力和武装侵略的威胁下，清政府于1850年5月，表示愿意就西部地区通商贸易同俄国进行谈判，并且接受沙俄的要求，在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暂行贸易”。同时，通知俄国政府于次年春派员来伊犁具体谈判，中俄双方派出代表商谈通商和贸易往来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在沙俄的威胁利诱下，清政府屈膝投降，于1851年8月6日，同俄国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除“喀什噶尔通商案”外，完全满足了俄国侵略者的各项要求。章程的主要内容有：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台设置领事馆，享有领事裁判权；俄国商人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地进行贸易，并免交税金；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台设置商站，即俄商在伊犁和

塔尔巴哈台两个地方自己建造“贸易亭”，就是贸易圈。通过不平等的通商章程，沙俄夺得了向中国西部地区倾销商品和免税的权益，还享受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建立市场、货栈和居住地的特权。其恶果在于使俄国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控制了中国西部边疆，并为尔后沙俄对新疆地区的经济、政治侵略铺平了道路。《通商章程》签订后三年，沙俄对华输出的商品就增加了六倍左右。对于这个《通商章程》签订的重要性，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新成就，其真正的意义将由俄国整个商业界给予应有的评价。

（罗日科娃：《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沙皇政府在中东的经济政策和俄国资产阶级》，第343页，1949年莫斯科—列宁格勒出版）。沙俄侵略扩张主义分子巴布科夫也毫不讳言地说：“……伊犁章程不仅在商务关系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它变成了继续深入中亚腹地的强烈催化剂。”（《巴布科夫回忆录》，第134页）。驻北京东正教士团领班佟正笏，向俄国政府和资本家提供中国经济情报，开辟中国西北通商贸易，起到重要的作用。“他（注：指佟正笏）给俄国商人出谋划策，使商品在中国市场上找到销路，告诉他们市场行情，为从中国向俄国商人进口茶叶寻找新的门路，在银价涨落期间，告诉俄国商人应该采取怎样的正确措施。一句话，波里卡尔普（注：指佟正笏）……表现了非凡的才能和创造精神。”（格列波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载《东正教之光》第24页，1935年哈尔滨俄文版）。由此可见，俄国东正教驻华传教士团，是一个地地道道俄国政府侵华的别动队，同时也是俄国资本家在华的忠实坐探。

中俄两国的贸易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有了很大的增

长。仅以恰克图为例，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平均每年购买中国的茶叶不超过四万箱，但在1852年就达到十七万五千箱，其它如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俄国。同时，俄国向中国出口的棉织品、毛织品、皮革、精致的金属制品、毛皮和大量的鸦片，迅速地增加。当时中俄两国买卖货物的总价值可达一千五百万美元。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一地，由于中俄两国贸易的发展，便成为一个由较小的普通集市地，发展为相当大的城市。不仅这样，恰克图和北京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联系。俄国通过对中国的不平等贸易，竭力推行殖民主义扩张政策，而俄国驻北京的东正教士团是一支重要的侵略先遣队。1853年，俄国驻京东正教士团领班帕拉季·卡法罗夫(即巴拉第)，在写给俄国政府的一封密信中，比较详尽地提供了由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使得由南到北运输茶叶受到严格的控制，因而恰克图的中俄茶叶贸易发生大幅度下降的情报。此事俄国外交部在写给财政大臣坎克的信中完全证实。信中承认，驻北京俄国东正教士团，向俄国政府提供了从福建运输茶叶到恰克图的有关情况。

俄国驻华东正教士团还间接或者直接掠夺中国的土地和贩卖人口。俄国的“寺院是最重要的土地占有者。西伯利亚东部的寺院，在十七世纪利用了女性人口的不足，就购买被虏去的布利亚特和蒙古妇女；为他们施洗，然后把他们嫁给俄罗斯的自由‘流浪人’，借以从他们那里取得为寺院耕种田地和为寺院尽种种义务的卖身契。”(格列勃：《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载《东正教之光》第24页)。在公元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东正教会仅仅在北京一个地区，就直接占有中国土

地一万余亩，每年从农民身上搜刮大量的地租。“住京俄罗斯达喇嘛（注：即东正教）固里报告，俄罗斯北馆后墙有空地一段，官房七间，求为查验，给予圈进馆内房间等。”（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下册，第1025页，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俄罗斯北馆，坐落在北京市东直门北角楼原镶黄旗的旧址上。该馆北墙外东北角官街空地一段，面积是三点八亩；西北角地一段，面积为一亩。总共的面积为四点八亩，内有官房七间。这些土地和房屋均为东正教士团所占据。公元1904年，第十八届俄国驻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领班英诺肯提伊，借口修建教堂，在河北省遵化县境内，强行购进了方圆五、六十里的土地。对当地农民群众进行直接的经济剥削和压迫。如象斯捷潘·齐明所承认：“教堂用高价租给当地居民房屋地产，进行剥削，使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一个租户不付三个月或五个月的租金，就在深更半夜中丢下了破烂的房舍，带领他们的家属和财产逃亡。……他们拆下棚架，推倒了地板和炉子，拆除了窗户，并且有时在逃亡时把家具、杂物捣毁。”（阿多拉斯基：《东正教两百年在中国的传播》，载《东正之友》1887年8月号，第420页。参照威德默：《十八世纪北京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1976年哈佛出版社英文版，第99页）。

俄国东正教会在中国开办了一些工厂和农场，直接参与剥削中国工人的罪恶活动。他们在中国一些地方开设了面粉厂、榨油厂、制酒厂、印刷厂、纺织厂和畜牧场等等。这些传教士团除了利用中国的原料之外，还大量雇有廉价的劳动力，特别是使用童工和成年的学生，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在这些工厂生产的工人，比一般工厂的工人工资低，而工作

时间更长，生活极端贫困。在东正教会所开办的工厂、农场工作的工人，除了遭受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外，还增加了思想上的毒害和精神摧残的枷锁。强迫工人信奉东正教，接受他们的宗教说教。如若不从就被赶出工厂，流落街巷，沿途乞讨。

俄国政府把从中国勒索的大量赔款的一部分，拨给在华的东正教传教士团使用，作为侵华的活动经费。东正教士团利用这些赔款，在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西北等地，大肆修建和扩建东正教堂，并在教堂的四周实行圈地一大片的侵略活动，从中又霸占了中国的一些土地。他们还任意平毁中国人民世代居住的田园房舍，逼迫大量的中国居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据有关材料证实，东正教传教士团在北京所开办的各种工厂、企业、农场的收入，就可以供给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所办两个分堂的全部费用。（马克西姆：《北京阿尔巴津人的情况》，载《中国福音报》1935年第3期，第16—17页）。由此可见，在华的俄国东正教士团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何等深重，对中国人民的经济剥削异常残酷。对于俄国东正教在华的经济侵略活动所起的作用，俄国学者格列勃夫坦白地承认，东正教士团忠告俄国商人，哪些商品只能在中国市场畅销，告诉他们市场行情，给俄国商人指出了毫无差错的行动方针。（格列勃夫：《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载《东正教之光》1935年哈尔滨俄文版，第24页）。

#### （四）推行沙俄文化侵略的先导

侵略成性的沙皇俄国的对外扩张政策和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世界野心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侵略中国的漫长的历史

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毛泽东同志曾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2—593页，1966年12月北京版）。帝国主义在中国搞的所谓“慈善事业”、“文化事业”，同“宗教事业”一样，都是直接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服务的。而俄国在华的东正教士团正是沙俄对外进行文化侵略的一支别动队。

1700年俄国皇帝彼得一世，在“特谕”中要求在华活动的神职人员，应当“通晓汉蒙语言”，以便深入全面地调查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及时掌握动态，采取对策。时隔不久，在伊尔库茨克的修道院长普拉特科夫斯基，按照沙皇政府的指令，创办了一所蒙文学校，招收了二十五名学生进行培训。这些学生结业以后，就被分配到中国蒙古地区进行活动，专门从事搜集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其它方面的情况，为以后侵略和霸占中国领土，甚至肢解蒙古作好准备。在此期间，俄国驻华的东正教士团，先后在中国一些地方设立了学习汉语学校，培养精通中国语文的侵华分子。除此而外，俄国政府为了加快培训对华侵略的队伍，从十八世纪后半叶开始，定期地选派精明强干的青年来华，以学习汉、满、藏等语文为招牌，从事对中国各个方面情报的搜集和研究，为其侵华政策服务。据统计，从第一届来华的东正教士团中的学生始，到第十三届随团学生为止，总共约有来华学习的学生四十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派遣来华学习的学

生人数越来越多，而且学习的时间不受限制，这就为它们的活动提供了更多机会与条件。

这些来华的所谓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学生，在中国干了些什么活动呢？1742年俄国派往北京学习汉语的学生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来华前是莫斯科神学院的学生。1762年他曾作为俄国信使、近卫军退伍中尉伊万·克罗波托夫的秘书派至中国。他还在中国清朝理藩院和俄国外交委员会当过翻译。在华期间，他搜集了不少中国的文化典籍，并从汉、满文中翻译了二十多种关于中国历史、地理、法律、哲学、中俄关系等著作，如《大清律例》、《理藩院则例》、《四书》、《大学》、《中庸》等等。他还将搜集的材料特地编译了《中国地理手册》。1727年被俄国政府派往北京学习汉语的伊拉里昂·罗索欣，1741年回到彼得堡，担任汉语和满语的翻译。他把清朝大臣图理琛编撰的《异域录》翻译出来，于1764年出版。象叶菲姆·萨赫诺夫斯基，1744年由俄国政府派到北京学习汉语的学生，后来回国在恰克图海关供职。又如随同第十届驻京俄国东正教来华的学生康德拉特·格里戈里耶维奇·克雷姆斯基，在华十多年间，搜集了大量中国文化资料及其它情况。此外，他还亲自参加了由侵华分子穆拉维约夫组织的“阿穆尔考察团”，在黑龙江地区进行侵略活动。

俄国除了派遣来华学习的学生进行侵略活动外，还不断派遣所谓学者、科学家、医生等从事文化侵略。第十二届传教士团的随团工作人员、俄国科学院院士瓦·帕·瓦西里耶夫，在华期间，醉心于搜集中国的宗教和历史文化。他竭力在华鼓吹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是欧洲“黄祸论”的始作俑者。他回国后写了不少书如：《佛教的教义、历史及

其文献》、《元明时期的满洲人》、《中国文学概论》、《清初对蒙古人的征服》等等。这个殖民主义者，被御用学者大肆推崇，说“他的著作，一方面填补了俄国中国学的空白；另一方面也为俄国的佛学、中国文学史、中国史料学的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瓦·斯·米亚斯尼科夫《苏联中国学的形成和发展》，载《苏联的中国学问题》）。

俄国派驻在华的东正教传教士团，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日益猖獗，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搜集情报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第九届驻京俄国东正教士团领班、修士大司祭雅金夫·比丘林，从1807年至1821年的十四年间，他利用传教士这张画皮作掩护，广泛结交上层清朝官吏和权贵，施展金钱收买和威逼手段，探取中国内政的机密。他还从满族官员和蒙、藏少数民族上层王公贵族中，窃得有关情报资料和历史文物，并且将所搜集的材料进行翻译和编写书籍。据有关资料记载，他翻译和编写了几十种关于中国的历史、地理、宗教、民族、风俗习惯等著作。如《蒙古志》、《西藏志》、《自古以来厄鲁特人或加尔梅克人历史概述》、《中华帝国统计资料汇编》、《北京志》等等。这个侵略分子，公然把中国珍贵的文化典籍和著名的历史文物，累计重达几吨偷运到俄国。其中汉、满文的中国书籍有十二箱之多。全部东西的数量，比前八届传教士团带回去的中国图书资料、文物古籍的总和还要多。

“比丘林所搞到的收藏品填满了俄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戈尔巴切娃、吉洪诺夫：《俄国研究中国史略》，载《苏联东方学》1955年第2期，第141—142页）。对于比丘林在华的侵略行径，一位俄国学者比较公正地认为，比丘林研究汉学的真正目的是，用自己的知识（包括汉学在内）为沙皇俄国外交政策服务。



比丘林供认不讳地说：“（我的）所有翻译和著作的全部目的，在于通过对中国初步情况的报道，以便深入到内部去。”（转引自帕·叶·斯卡奇科夫：《俄国中国学简史》第97页）。

沙俄对华文化侵略，不仅表现在利用宗教麻醉中国人民，而且还利用封建主义思想愚弄中国人民，乃至把这两种反动思想糅合在一起，以此作为统治中国人民的鸦片。在这方面俄国东正教在华传教士团更为典型。传教士大肆鼓吹孔孟之道，将孔孟学说中的糟粕加以装饰、美化，并大加发挥，贴上迷惑人们的商标。东正教士和随团的学生，积极地翻译和传播孔孟的学说。如《论语》、《大学》、《中庸》等。混入第十二届驻京东正教士团的俄国硕士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在华期间搞到了不少中国情况，并专门写了一本宣扬孔孟之道的书，题为《东方的宗教：孔教、佛教和道教》。又如东正教第九届驻京的领班、修士大司祭雅金夫·比丘林，竭力地吹捧“四书”是道德和治国的最纯正的概念，是儒家治国方案和道德的标准。第十届东正教传教士团随团来华学生康·格·克雷姆斯基，称赞孔孟的泛爱论是人类之禀赋，是人的本质。他在北京发表的《孔学义解》中说：“对国君要忠、要爱、要敬、要绝对服从，并要听从天命和圣人之言”。他还向人们宣传，要“爱古人之所爱，好古人之所好，行古人之所行。”（克雷姆斯基：《孔学义解》，《孔子学说实质概说》，俄国教堂圣母院印刷局，1906年北京俄文版，第26页）。第十二届俄国驻京东正教士团中的工作人员瓦·帕·瓦西里耶夫无耻地说：东正教士团在华“撒下了文化的第一颗种子，并且教导那些野蛮民族认识了真正的上帝。”（瓦西里耶夫：《中国的开放》第52页，1909年莱比锡德文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加紧对

中国的领土侵略。为了给侵略涂上迷惑人的色彩，要清政府对它们的侵略要求予以优待，1858年俄国政府在写给清政府军机处的谕文中说：“孔教使人友爱忍让，孝顺忠厚，诸事向善”，“如中国至尊者圣人，优待外国来使，则是益于国者，不能不为爱惜。”（《近代中国史稿》上册，第222—223页，197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就道出了俄国侵略者宣扬孔孟的反动实质。

曾担任过堪察加大主教和莫斯科都主教的费·莫诺肯提伊，后来被俄国派遣来华，担任第十八届东正教传教士团领班，在华期间就公开宣扬，“东正教教义纯正”，“堪与夫子（注：指孔夫子）之道相辅而行”。（北洋洋务局编：《乙巳年交涉要览》卷2，第88页）。在沙皇俄国正式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中，把孔子抬到吓人的程度，书中写道：孔子“志在为人类幸福奠定基础”。（《大百科全书》第111卷，第666页，1905年圣彼得堡出版）。这些东正教士、所谓汉学家、学生，如此狂热地推崇中国的旧文化和孔孟中的糟粕，其目的是什么？早期的苏联学者普·斯卡奇科夫就说道：“旧汉学是作为俄国专制制度政策的思想武器而发展起来的，沙俄在东方的推进在旧汉学中反映出来并找到辩护的理由，……俄国汉学家的骨干由北京俄国传教士团的成员——东正教士组成，他们在传布基督教的幌子下推行着外交职能，他们是俄国沙皇专制制度殖民政策的积极传导人。”（普·叶·斯卡奇科夫编：《中国书目》序言，第7—8页，1932年莫斯科版）。1960年苏联再版该书时，便全部将上述符合事实的话删掉了，其用心如何不言而喻。还是这个学者，把以前说过的或者写过的话一笔抹掉，而代之以“从罗索兴开始……以及后来的阿·列昂节夫、比丘林、卡法罗

夫，……的著作中，都找不到任何把俄中两国人民对立起来的提法。相反，俄国汉学者的绝大多数著作贯穿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好感，对其在清朝满洲帝国统治下蒙受封建压迫和民族屈辱的苦难寄予同情”。（帕·叶·斯卡奇科夫：《俄国汉学家的国际关系》，载苏联《远东问题》，1975年第4期）。这种违背历史事实的宣传，能够使多少人相信呢？中国历史证明，尊孔复古，不仅仅是国内统治阶级，而且也是国际侵略者在意识形态上残害中国人民的一把软刀子。所以，“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5页，1966年北京版）。

二十世纪初，沙俄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侵略。办报纸，是沙俄和其它西方列强“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对中国推行文化侵略政策的具体步骤。在日俄战争时期，沙俄政府为了和日本列强争夺中国而制造舆论，利用“华俄道胜银行”的雄厚资金，在北京创办了《燕都报》（《燕京报》）。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沙俄“中东铁路公司”，每年补助十七万卢布的经费，在哈尔滨创办了《远东报》。以此作为它和日本及其它列强，在远东的角逐的先声，并把它的发行范围扩大到南满和蒙古地区。同时，沙俄还在旅顺办了《关东报》，在沈阳办了《盛京报》。除此之外，沙俄又在哈尔滨等地发行了其他的报刊。据1909年的初步统计，沙俄在哈尔滨一地就发行了中、俄文报刊近二十种，开办了各种印刷所、书店（书亭）有十多处。这些报刊的出版和大量发行，散布了许多殖民主义谬论，宣扬它们的“文明”，鼓吹他们是“优等”民族，以此来毒害广大中国人民的思想，为他们侵华和建立殖民统治大造舆论。沙俄利用舆论工具，紧密地配合其军事、

政治、经济的侵略，为沙俄的侵华政策作辩护。同时，也制造反动舆论，破坏和污蔑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对此，革命导师列宁曾严正地痛斥沙皇政府和反动学者的无耻论调，他尖锐地指出：俄国政府及文人“在报刊上大肆攻击中国人”，向沙皇俄国“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拼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但是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

（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6—217页）。列宁还号召俄国人民和“一切觉悟的工人就有责任全力起来反对那些挑拨民族仇恨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的人们。”（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7页）。

#### （五）东正教士团积极参与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

斯大林同志正确地指出：“俄国曾经有一个时候是东方民族的恶魔，是一切解放运动的宪兵。”（《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90页）。1851至1864年，在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不甘受剥削和压迫的中国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统治者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此期间，驻北京的俄国东正教士团，充当了刺探情报、出谋划策、扼杀人民革命的角色。1857年3月，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驻京东正教士团的领班帕拉季按照沙皇的旨意，明确地向清政府理藩院表示：在清政府“内忧”期间，俄国政府“准备给以援助，既有道义上的援助，也有部分包括武器和炮弹在内用来对付国内敌人（注：是污指太平天国革命力量）的物质援助。”（1857年2月9日俄国亚洲司司长给驻北京传教士团首领的公函，转引自苏联《红档》杂志，1927年第2卷，

第191页)。卖国求荣的清朝政府，为了扑灭国内人民革命的熊熊烈火，完全接受俄国的军援。咸丰九年四月十二日（1859年）咸丰帝谕僧格林沁等人云：“前有旨令德勒克多尔济俟俄罗斯国呈递鸟枪一万杆，炮位五十尊运至库伦时，奏闻办理。……现在和约已换，业经准其由海口进京。此项枪炮将来送至海口，着僧格林沁、恒福遴派明员干弁往晓谕，令该夷船停泊拦江沙外，毋须前进，另换内地船只装载运送到津。”（《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中册），第670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随后，沙皇政府派遣普提雅廷来华，“帮助”组织和训练清军，以达到“欲迅速代平叛乱”。（《咸丰朝始末》第16卷，第13页）。紧接着俄国驻京第十三届传教士团领班、修士大司祭帕拉季·卡法罗夫和普提雅廷在大沽口密商，具体提出由俄国“代平叛乱”的计划。之后，又提出“助剿”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三点实施计划：①要清政府购买沙俄政府的军火。②派遣俄国军官五名，协助训练清朝军队。③允许俄国军舰在太平军活动的长江自由航行。此外，俄国政府还拨款五十万卢布，“专供中国军事机构之用。”（波波夫：《太平天国起义时代的沙皇外交》，《红档》第21卷，第198页）。不久，俄国特使海军少将普提雅廷指示驻京第十三届传教士团领班帕拉季·卡法罗夫，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以俄国同意向清朝政府提供“两万支步枪、二十门大炮和教官”，同时还给“二十万两”银子为条件，换取清政府同意将新疆地区的“塔尔巴哈台货栈的剩余全部拆掉”，使“俄国享有和其他大国同等的权利，并且满足它边界要求。”（《帕拉季1858年日记》第9、19页，转引自索特·德特：《我们在东亚的扩张（1857—1860）》第114—115页，1968年吉隆坡出版）。

继帕拉季之后，由俄国驻京第十四届东正教传教士团领班、大司祭固礼加以接替，活动更为频繁。1861年，固礼积极策划俄国军官，前往“张家口一带教演，其炮位五十尊，运至天津海口”的活动。（《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五）。固礼又积极地参与沙俄公使巴留捷克等人武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罪恶活动，无数革命人民惨遭杀害。1862年沙俄派兵参加了英、法在上海组织的武装干涉军。沙俄驻华公使巴留捷克，大肆攻击太平天国革命是“贼匪扰乱”，并称沙皇特派“总管东洋俄国兵船水师提督波波夫，带领兵船前赴中国”，“帮同”清军“堵御击退”。（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历史组：《沙俄武装干涉太平天国革命的罪证》，《文物》1975年第二期）。同年12月，波波夫带领俄国兵舰三艘，驶入上海帮助清军前来堵剿。清政府决定让俄国兵舰“暂驻上海”，共同绞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董恂：《洋兵纪略》，《太平天国》第4册，第550页）。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爆发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对于严重威胁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的义和团运动，沙俄政府伙同其它列强，派出大批侵略联军血腥进行镇压。在进犯天津时，沙俄侵略军首先在大沽口打头阵。在攻占北京后，又是沙俄和其它列强四处抢劫中国的珍贵文物，残酷杀害无数的和平居民。与此同时，沙俄还出动十七余万侵略军，大举向东北三省发动侵略战争，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而俄国东正教士也加入了这股侵华的行列。在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的镇压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被绞杀。沙俄与其它列强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单就赔款一项，沙皇俄国就向中国勒索了一亿三千多万两白银，占整个赔款总数的29%，是帝国主义列

强中分赃最多的一个。此外，沙俄以教堂、育婴堂被毁、教士被杀，坟地被掘为借口，又额外的向中国勒索了宗教赔款一万八千两白银。对于俄国东正教会在华的侵略行径，一个英国学者在所著的书中写道：对于中国各个方面的情报的搜集，“俄国的常设机构有着一百七十三年未曾间断的纪录，它最初由围攻雅克萨所捕获的俘虏所组成，随后变成了东正教的一所僧侣学校和沙俄帝国的一个政治上的哨兵，它对1858年和1860年突然登场的两位派头十足的大使（注：指俄国当时派驻中国担任过公使的普提雅廷和伊格纳切也夫）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这个教会起着反射镜的作用，通过它俄国能够深透看到中国政府的奥妙的地方，而在中国来说，它又是一个玻璃瓶口，通过它把外界天地折射给他们。……他们与中国官员之间，……友情深厚的。满清政府或各省督统与任何外国人之间的通信，不管是行政上的，皇朝政治方面的，或是公事上的权谋，很少能逃过俄国教会档案的记录。凭据他们自己的机智……，教会所有的人员是不会受到迫害或者凌辱的”，“他们的名字就成为一个安全的护身符”。（米歇：《阿利国传》第1卷，第355—357页，爱丁堡与伦敦1900年版）。

#### （六）东正教士在华的横行

俄国派驻中国的东正教士及其所谓学生，披着“仁慈”、“文明”的外衣，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象第一届东正教传教士团的领班伊拉里宛·列扎伊斯基，就是一个酗酒无度，醉生梦死、贪婪好财的吸血鬼。又如第七届东正教士团中的修士司祭安东尼，就是一个寡廉鲜耻的无赖之徒。修士辅祭伊兹拉伊尔，也是一

个放荡无羁的寄生虫。这届随团的三个学生：叶戈尔·萨列尔托夫斯基、伊万·菲洛诺夫、阿列克谢·波波夫，都是因放纵酗酒而丧命。更为突出的是这伙东正教在华的神职人员，相互斗殴、打架，甚至用刀子伤人，闹得乌烟瘴气。对此，一个俄国古文献学家在书中写道：“两个教堂（注：指在北京东直门和安定门之间的圣尼古拉教堂，以及在东交民巷俄国使馆附近修建的东正教堂。）的总管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和教堂辅助人员相处不睦，因而中国朝廷对他的行为很不满意，希望另换传道团团团长。在北京的俄国学生中，只有四人适于学习，沃耶伊科夫和舒利金总是酗酒无度”。

（〔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224页，1982年11月商务印书馆第一版）。东正教士在华的丑行，连清政府也提出警告，清理藩院在致俄国枢密院的信中说：“修士司祭伊万（注：指伊万·菲利波夫，是留居北京的俄国司祭）不能同驻敝国的贵国学生平静相处，经常不睦，争吵不休。他严重地砍伤了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注：指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是伊尔库茨克主升天修道院修士大司祭，曾随同伊兹马伊洛夫使团前往北京，担任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传道团的领班）的手，因此现将司祭伊万送交贵国边防长官。”而修士大司祭本人也曾将这一可耻事件于7月25日（注：指1731年）向外务委员会写了报告，其中说：“6月22日，修士司祭伊万犯规酗酒，在俄馆追逐学生，且先向他——修士大司祭的脸上吐唾沫，然后用刀子把他的手砍伤；根据博格德汗（注：指清朝雍正皇帝）的谕旨已将该修士司祭伊万带上镣铐拘禁起来。”（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217页，1982年11月商



务印书馆第一版)。

俄国驻华的东正教士团人员，采用各种手段，强迫当地群众信教、入教。如东正教传教团领班、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于1736年6月30日向俄国最高宗务会议的请求报告中说：“寄给他为在北京新建教堂举行开堂仪式用的圣餐布、圣像壁、祭服、全套教堂用书，还有祭坛、钟和维持该教堂用的款项；给他送去五百个银制十字架和同样数量的耶稣小圣像，用于分发给新受洗的中国人，因为他手中原有的上项物品全都发给了二十五名过去已受洗的中国人；规定发给贫困的受洗者救济金；允许他通过翻译听取新受洗的中国人作忏悔。”（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227—228页，1982年11月商务印书馆第一版）。对于东正教士和学生居民中进行传教活动，拉拢当地群众入教的情况，在清政府掌江南道监察御史富稼的奏折中可见到：“窃查向来俄罗斯来京学生，分居南北两馆，除喇嘛学生外，仆从仅留二十名。此次来京人数较多，且形状异常，时有招聚贫民，每以一千文钱票暨尺等物散赠，声言伊国大臣睹尔贫寒，好善乐施，得贿者皆系游优无迹之乞丐。曾经理藩院出示，禁其出馆街巷闲行，招摇穷民蜂拥于馆首，因而扫尽伊等逞富之兴，遂失所望也。南馆地当教民巷，系通衢耳目，易得见闻之处。惟北馆地当东直门内东北隅，向称不静之所，旗民杂处，且多贫苦之家。奴才风闻该夷近日仍假济贫之端，乃便施惑众之举。家有稚子幼女者，诱人习教，先给三、四百吊文，月有供给。领人子女入馆曰当差，如无子女者少妇亦许之，每七日为一班。该夷居京，理佛念经，例原不禁。……当兹有事之秋，不可不预为防范。此外仍有

唤入铁匠、木匠工做，成月在内之事。请……详细查明究办，以杜摇惑人心而免流毒于内地。再，旗民习练久干例禁，今夫不肖受其贿诱，敢忘二百余年豢养之殊恩，致将子女服役于外夷，实属玩法灭伦之至。”（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下册），第844—845页，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

俄国驻华东正教士，还不断搜刮钱财。象负责在京的俄国两个教堂的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竟然“不顾祖国（注：指俄国）的荣誉，曾多次向蒙古衙门提出请求，给他全部教堂用物。他屡次请求，使清朝官员不胜其烦，在理藩院给他穿上了全套教堂衣服，给他定做了数件祭服和一顶帽子，但是拒绝给他钻石戒指。他曾为这个戒指恬不知耻地一再要求，并想使中国大臣相信，似乎没有这个戒指，他就不能做祈祷。驻北京的俄国学生阿列克谢·弗拉迪金、伊万·贝科夫、卢卡·沃耶伊科夫、伊拉里昂·罗索欣、格拉西姆·舒利金和米哈伊尔·波诺马廖夫曾请求蒙古衙门给他们每人五十两银子，但遭到拒绝，这种无耻行为受到申斥，因为他们除领取俄国发给的薪俸外，还由中国国库发给他们——学生和教堂辅助人员，每人每月三两银子，而修士大司祭和修士司祭则加倍发给。”（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第240页，1982年11月商务印书馆第一版）。对于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传教人员和学生的秽行，连当时的俄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俄国驻北京传道团人员的放荡行为，不仅宗教人员，而且还有派去学习满语、汉语的学生弗拉迪金（注：指1731年被俄国政府派往北京学习汉语的学生阿列克谢·弗拉迪金，1746年回到俄国，后来又被

任命为俄国商队的总管前往北京) 等人的生活荒唐和酗酒 (这对当地居民起了不小的诱惑作用)、打架斗殴, 对上司不服从, 以及中国大臣对该传道团的怨恨和蔑视, 促使女皇于 9 月 9 日下达一道谕旨, 其内容是: (1) 将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及教堂辅助人员由北京带回俄国, 并把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送交最高宗务会议监禁, 生活费自理; 派曾随西伯利亚商队去过北京的托博尔斯克主教府的修士司祭伊拉里昂·特鲁索夫 (注: 此人于 1741 年在北京死去) 接替他的职位, ……还命令修士大司祭对驻北京的俄国学生要严加看管, 如有不服从, 不勤奋学习以及行为不端的, 要对他们进行制裁; 根据他们的劣行, 虽不予以正式逮捕, 但可把他们禁闭在俄馆特定的房间里; ……” (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第 247—248 页, 1982 年 11 月第一版, 商务印书馆)。1740 年 6 月 10 日, 在京的俄国学生阿列克谢·弗拉迪金写给俄国外交委员会的报告中说, 驻中国的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特鲁索夫, 纵饮无度, 还有褻渎行为, 他常常穿着中国女人的衣裳, 有时竟穿这身衣服到教堂去。他的这些行为遭到中国人的咒骂。为此, 次年 3 月 11 日, 俄国为了挽回面子, 掩盖东正教人员的丑行, 撤销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特鲁索夫管理驻北京东正教士团和学生的职务, 并派了拉夫连季·乌瓦罗夫接替其职务。俄国商队总管菲尔索夫, 于 1742 年 8 月向外务委员会报告中说, 驻北京的俄国宗教人员大多都是以酗酒、互相吵架、胡作非为混日子。

俄国驻北京东正教士任意践踏中国法律, 扰乱社会治安, 故意制造事端。俄国驻北京第六届东正教士团的学生雅科

夫·科尔金，外出时经常寻衅闹事，侮辱和殴打中国居民，激起当地人民的愤怒和反对。第二、三届驻京的传教团的修士辅祭约阿萨夫，竟然无视中国主权和法律，窜进清政府的宫苑无理取闹，甚至行凶打人。腐败无能的清朝官员，对这些洋教士百依百顺，奴性十足。形成了“各国教士，无论有无官爵，辄与各省大吏抗衡。”（《清史稿·列传》卷52，第39页）。东正教士团的领班帕拉季·卡法罗夫（是第十三届东正教士团的首领）有一次到天津时，清政府还专门派理藩院郎中苏彰阿等人护送，并由清兵排列欢迎，以壮声势，活现出奴才侍候主子的媚相。俄国传教士还直接干预和侵犯中国的司法权利。1870年清政府在处理天津俄国教案时，俄国公使倭良嘎里根据沙皇政府的指令，要求派人参加审判，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和行使司法权利。

俄国在华的东正教士，同英、美、法等列强的传教士一样，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欺压群众，屠杀无辜，甚至奸淫妇女、残害幼儿、掠夺财物和文化典籍等。他们的种种罪恶行径，必然激起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席卷中国大地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个突出的革命事件。义和团广大战士，拿起武器不断地打击着帝国主义。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义和团势如破竹地摧毁了沙俄和其它列强的教堂，以及其它传教设施。北京人民奋起捣毁了俄国驻华传教士团的老巢——俄罗斯北馆，房舍被焚毁，一些作恶多端的东正教徒和传教士被打死。在义和团战士的沉重打击下，俄国“东正教会修道院长、传教士团教士”及“中国教徒”，狼狈逃至“原传教士团所在地邻近的雍和宫里。”（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著《八国联军目击记》第356页，1983年8月第一版，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民反对沙俄和其它帝国主义、以及传教士的斗争，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英雄气概。列宁愤怒地斥责俄国和其它列强的侵华行径，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深表同情，指出：“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民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4页）。

## 五、俄国东正教会反动势力在中国的覆灭

沙俄帝国主义为了称霸世界，积极地推行向外侵略扩张的殖民政策，从而加剧了同国内外人民之间的矛盾，也加深了同其它帝国主义之间的尖锐对立。沙俄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仅给其它国家和人民，而且也给俄国广大劳动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00年沙皇政府发动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千上万的各族人民惨遭杀害，无数房屋被焚毁，巨额的财产被抢劫一空，富饶的土地为侵略者侵占，中国神圣的主权被践踏。不但如此，沙俄的侵略，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痛苦。沙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对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有什么好处呢？成千上万个家庭因劳动力被拉去打仗而破产，国债和国家开支激增，捐税加重，剥削工人的资本家的权力扩张，工人的状况恶化，农民的死亡有增无减，西伯利亚大闹饥荒——这就是对中国的战争能够带来而且已经带来的灾难。”（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

选集》第1卷，第215—216页)。这时，沙俄的经济危机日趋严重。物价飞涨，工业产品产量明显下降，工厂企业倒闭，数十万工人失业，流落各地。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于是在彼得堡、巴统、罗斯托夫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示威。而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先后在乌克兰、伏尔加河等农业地区掀起，强烈地反对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导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的真正实质是帝国主义争夺赃物的侵略性质的战争。沙俄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参加这场侵略战争。此间，沙俄没有忘记在中国的霸权地位，阴谋彻底瓜分中国，妄图实现把沙俄边界一直向南推进到中国长城脚下的侵略野心。彻底瓜分中国，只不过是沙俄帝国主义的一厢梦想。随着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这就宣告了沙皇俄国侵华政策的彻底破产。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新纪元。列宁领导的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和公元1920年9月27日，发表了对华宣言，宣言明确地宣布：苏联工农政府“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的“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都不得干涉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当地法院审判”。同时，还再次重申：“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苏中

关系1917—1945》文件汇编，1959年莫斯科版，第43—44、52页）。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列宁的这些无产阶级政策没有能够付诸实现。

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建立之后，对于宗教采取了明确的政策。苏维埃政府取消俄国东正教的一切特权，实行政教分离，准许东正教士进行正当的宗教活动。不甘失败的反动教会势力，妄图从其它方面破坏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在国外的东正教会，特别是在中国东正教士团，竭力地反对列宁领导的苏联无产阶级政权，紧紧地依附于反动的塞尔维亚俄国东正教流亡教廷。在十月革命的致命打击下，一批东正教士、白匪军官、王室贵族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纷纷逃到中国境内，和留在中国的俄国东正教会人员勾结起来，组成了一支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别动队，进行各种破坏和捣乱。如大主教梅列基斯就在哈尔滨建立“俄罗斯社会事业委员会”，作为收罗逃窜到中国的俄国反动分子和其他人员的场所。到1935年底，搜罗了白匪六千七百七十八人。第十九届俄国驻华东正教士团领班、大主教西蒙和第二十届东正教士团领班，由大主教魏克托尔担任。混进第二十届东正教传教士团的掌院大司祭那发那伊勤和甘魏拉伊勒、修士大司祭尼古拉等人，都是流亡在华的白匪军官，而修士大司祭萨多克也是一个旧俄警官。

在我国民主革命的各个历史阶段，反动的东正教士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以及其它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但是，历史前进的车轮，是任何内外反动势力所无法阻挡的。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长期的武装斗争和其它形式的斗争，终

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立了起来，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一个任人宰割、受奴役、剥削和压迫的中华民族的旧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中国革命的胜利，把侵略中国多年的俄国驻华东正教会反动势力，从辽阔的中国土地上驱逐了出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普照着新中国，并指引着中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胜利前进！

沙皇俄国利用宗教侵略、奴役、欺骗和掠夺中国的肮脏历史，是沙俄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侵略中国长达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中，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与痛苦，而决不是象辩护士所说的“友谊”、“文明”和“幸福”，更不是向中国人民传播人类进步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的“伟大”使者。大量的历史事实将永远把俄国驻华东正教士团的丑行，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 附：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人员 和学生及其他世俗人员情况

### 第一届

团长（领班）：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

其他宗教人员：修士司祭拉夫伦齐（拉夫连季）·乌瓦罗夫，修士司祭伊万·菲利莫诺夫，教堂堂长菲力蒙，修士司祭乌西夫。

教堂辅助人员：约瑟夫·阿法纳西耶夫，彼得·卡尔马克，尼卡诺尔·克柳索夫，伊拉里昂·雅库特，费奥多尔·别尔卡，奥西普·季亚科诺夫。

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以后有如下几名学生来京：卢卡·沃耶伊科夫（莫斯科神学院学生），伊万·雅勃隆采夫（莫斯科神学院学生），费奥多尔·特列季雅科夫。这些学生都是由俄国政府派往中国学习汉语和满语（以后来华的学生都如此）。

### 第二届

团长（领班）：修士大司祭安东尼·普拉特科夫斯基（原是伊尔库茨克主升天修道院修士大司祭）。

其他宗教人员：修士司祭伊万·菲利莫诺夫，即约翰，修士司祭拉夫伦齐（拉夫连季）·乌瓦罗夫（上届留任），修士司祭伊万·菲利波夫（打架闹事，酗酒，被清政府驱逐出境），修士辅祭约阿萨夫（1747年死亡）。

**教堂辅助人员：**纳拉巴尔金，安德烈。

**学生：**伊拉里昂·罗索欣（1761年死亡），格拉西姆·舒利金，米哈伊洛（米哈伊尔）·波诺马廖夫。

### 第三届

**团长（领班）：**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特鲁索夫（1741年因故遣回俄国）。后来由修士司祭拉夫连季·鲍勃罗夫尼科夫代理。

**其他宗教人员：**修士司祭拉夫连季·乌瓦罗夫（上届留任），修士司祭安东尼·卢霍夫斯基，修士司祭约伊利·鲁勃列夫斯基，修士辅祭约阿萨夫（上届留任），修士司祭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是1742年派往北京）。

**教堂辅助人员：**彼得·约夫列夫（也译雅科夫列夫），彼得·卡缅斯基，雅科夫·雅库特，米哈伊洛·伊万诺夫。

**学生：**格拉西姆·巴里什尼科夫（也可译为巴雷什尼科夫），阿列克谢·弗拉迪金（1746年回到俄国，后又派往任俄国商队总管前来中国），伊万·希西罗夫，伊万·贝科夫，米哈伊尔·波兹尼亚科夫，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1762年作为克罗波托夫的秘书派往中国），安德烈·卡纳耶夫（莫斯科神学院学生，可译作科尼亚耶夫，或科佩洛夫），尼基塔·切卡诺夫（又译作恰卡诺夫，莫斯科神学院学生），伊万·希哈列夫（1742年死于北京）。

### 第四届

**团长（领班）：**修士大司祭格尔瓦西·林采夫斯基。

**其他宗教人员：**修士司祭约伊利·鲁勃列夫斯基（上届留任），修士司祭费奥多西·斯莫尔热夫斯基（上届留任），修士辅祭约阿萨夫（1747年死亡，上届留任）。

**教堂辅助人员：**索宗特·卡尔波夫，基尔·别列茨基，基里尔·谢苗诺夫，斯捷凡·特列季雅科夫，伊万·库兹涅佐夫。

**学生：**叶菲姆·萨赫诺夫斯基（后来在恰克图供职）。

### **第五届**

**团长（领班）：**修士大司祭阿姆夫罗夫·尤马托夫（1771年死于北京）。

**其他宗教人员：**修士司祭西尔威斯特（1773年死于喀山），修士司祭索夫罗尼，修士辅祭谢尔基。

**教堂辅助人员：**斯捷凡·齐明，伊利亚·伊万诺夫，阿列克谢·达尼罗夫。还有本届修士大司祭和修士司祭的差役有三人：瓦西里·亚历山德罗夫，伊万·科兹洛夫斯基，格里戈里·斯皮增。

**学生：**彼得·雅基莫夫（1762年派往中国学习）

### **第六届**

**团长（领班）：**修士大司祭尼古拉·茨维特。

**其他宗教人员：**修士司祭尤斯特、修士司祭约翰尼基·普罗托波波夫，修士辅祭尼基弗尔。

**教堂辅助人员：**彼得·罗吉昂诺夫，尼康（他离开北京后，削发为修道士时所取的名字）。

**学生：**费奥多尔·巴克舍耶夫（回到俄国后，在俄国外务委员会供职），阿列克谢·巴雷绍夫，雅科夫·科尔金，阿列克谢·阿加福诺夫（学习后回国，在俄国外务委员会供职）。

### **第七届**

**团长（领班）：**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又译为尤斯京·希什科夫斯基）。

**其他宗教人员：**修士司祭安东尼（此人喝酒无度，因酒醉睡在热炕上被烫伤，不久而死），修士司祭阿列克谢，修士辅祭伊兹拉伊尔（此人纵酒、放荡）。**教堂辅助人员：**伊万·奥尔洛夫，谢苗·索科洛夫斯基。

**学生：**安东·弗拉迪金（莫斯科神学院学生，回国后得到嘉奖，授予八等文官），叶戈尔·萨列尔托夫斯基（莫斯科神学院学生，因酗酒而死于中国），伊万·菲洛诺夫（又译为菲利莫洛夫，因酗酒无度死在中国，原是莫斯科神学院学生），阿列克谢·波波夫（莫斯科神学院学生，因纵酒死在中国）。

### **第八届**

**团长：**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鲍夫斯夫。

**其他宗教人员：**修士司祭伊耶谢，修士司祭瓦尔拉阿姆，修士辅祭瓦维拉。

**教堂辅助人员：**科兹马·库尔金斯基（也可译为卡拉金斯基），瓦西里·鲍戈罗茨基。

**学生：**帕维尔·卡缅斯基（此人于1820年再度来华，以修士大司祭的身份出现，是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卡尔普·克鲁格洛波列夫，瓦西里·诺沃肖洛夫，斯捷凡·利波夫佐夫，伊万·马雷舍夫。

### **第九届**

**团长：**修士大司祭雅金夫·比丘林（又可译为俾丘林）。

**其他宗教人员：**修士司祭阿尔卡季，修士司祭谢拉菲姆，修士辅祭涅克塔里。

**教堂辅助人员：**瓦西里·雅菲茨基，康斯坦丁·帕洛莫夫斯基。

**学生：**马尔克尔·拉克罗夫斯基，列夫·齐马伊洛夫，

米哈伊洛·西帕科夫，叶夫格拉夫·格罗莫夫。

### 第十届

团长：修士大司祭彼得·卡缅斯基（即第八届随团来华学习的学生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卡缅斯基，削发后圣名为彼得）。

其他宗教人员：修士司祭维尼阿明·莫拉切维奇，修士司祭达尼伊尔·西维洛夫，修士辅祭伊兹拉伊尔。

教堂辅助人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沃兹涅夫斯基，阿列克谢·伊萨科维奇·索斯尼茨基。

学生：康德拉特·格里戈里耶维奇·克雷姆斯基，扎哈尔·费奥多罗维奇·列昂季耶夫斯基，瓦西里·基里洛维奇·阿勃拉莫维奇。

医生：约瑟夫·帕夫洛维奇·沃伊采霍夫斯基。

### 第十一届

团长：修士大司祭维尼阿明·莫拉切维奇（第十届东正教传教士团的修士司祭）。

其他宗教人员：修士司祭阿瓦库姆·切斯诺伊，修士司祭费奥菲拉克特，修士辅祭波利卡尔普·图加里诺夫。教堂辅助人员：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罗佐夫。

医生：波尔菲里·叶夫多基莫维奇·基里洛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科万尼科，库尔梁德佐夫，叶皮凡·伊万诺维奇·瑟切夫斯基。

画家：安东·米哈伊洛维奇·列加绍夫。

### 第十二届

团长：波利卡尔普·图加里诺夫（又名佟正笏，是第十一届东正教士团的修士辅祭）。

其他宗教人员：修士司祭英诺森·涅米罗夫，修士司祭古里·卡尔波夫，修士辅祭帕拉季·卡法罗夫（也译为巴拉第）。

学生：约瑟夫·戈什克维奇，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戈尔斯基，伊万·伊里奇·扎哈罗夫（此人担任过俄国驻伊犁总领事）。

医生：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塔塔林诺夫。

画家：科尔萨林（此人名叫康德拉特）。

院士：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

### 第十三届

团长：修士大司祭帕拉季·卡法罗夫（此人是第十二届东正教士团的修士辅祭）。

其他宗教人员：修士司祭叶夫拉姆皮，修士司祭帕维尔，修士辅祭伊拉里昂，修士辅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乌斯平斯基，修士辅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涅恰耶夫，修士辅祭康斯坦丁·安德烈亚诺维奇·斯卡奇科夫。

医生：斯捷潘·伊万诺维奇·巴齐列夫斯基，米哈伊尔·达尼洛维奇·赫拉波维茨基。

画家：伊万·伊万诺维奇·奇茹托夫。

### 第十四届

团长：修士大司祭古里·卡尔波夫（此人是第十二届东正教士团的修士司祭）

工作人员：帕·斯·波波夫（任沙俄驻北京总领事）。

（其他人员情况不清）

### 第十五届

团长：修士大司祭帕拉季·卡法罗夫（此人是第十三届东正教士团的团长修士大司祭）。

(其他人员情况不清)

### **第十六届**

(情况不清)

### **第十七届**

(情况不清)

### **第十八届**

团长：都主教费古洛夫斯基·英诺肯提伊

### **第十九届**

团长：大主教西蒙

### **第二十八届**

团长：大主教魏克托尔（俄国旧军官，1920年逃到新疆、北京后，被第十八届领班英诺肯提伊收留，培养为修士司祭，并派到天津任教堂司祭，又升为总堂修士大司祭，后被祝圣为北京总会主教，1938年接替西蒙大主教的职务，成为第二十八届北京东正教传教士团的团长（领班）、大主教）。

其他宗教人员：掌院大司祭那发那伊勤，掌院大司祭甘魏拉伊勒，修士大司祭尼古拉，修士大司祭萨多克。

(1974年10月初稿，1978年修改稿，1983年8月第三修改稿，1984年3月第四次修改)。